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 (甘) LK000046

# 教学参考

JIAO XUE CAN KAO

- 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分量
-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明特质、系统逻辑和强党功能
- 新型举国体制:时代背景、基本特征与适用领域
- 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科学认知的突破与发展方式的改变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主办

1  
2022

# 教学参考

2022年第1期

(总第693期)

2022年2月25日编印

主 编 杨文福

副 主 编 鲜 鹏

高继明

责任编辑 张雅丽

发送范围

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 Contents

## 目 录

###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分量 王一彪(1)

###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蕴再思考 何中华()

### ◎党建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明特质、系统逻辑和强党功能 闫晓峰()

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义 赵中源()

### ◎政治学

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框架体系与实践方略 袁红英()

新型举国体制:时代背景、基本特征与适用领域 谢宜泽等()

中国人权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 赵永华等()

### ◎经济论坛

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 张来明等()

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现状、展望及发展策略 田 原()

### ◎社会学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意蕴和思想智慧 顾海良()

### ◎理论探讨

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科学认知的突破与发展方式的改变 王心源等()

### ◎他山之石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管理的实践及启示 邹晓梅(47)

◎新书推介 (54)

### ◎刊中报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等8则 (28)

## 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分量

王一彪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计三万六千余言,全面回顾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历史成就,精辟提炼概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历史经验,不仅能够让人们清晰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历史方位,更为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历史鉴照,其厚重历史分量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理解。

**学习《决议》,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信**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决议》在序言部分用“四个伟大成就”,精辟凝炼地概括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成就。《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决议》专门用四个部分,对党在四个历史时期带领人民进行英勇顽强奋斗的历史进行了系统阐述。每个部分都从党在这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入手,按照党走过的不平凡

历程所蕴含的历史逻辑,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事件、所做的主要工作,实事求是地进行简明而系统的阐述,并用“四个伟大飞跃”对每个历史时期伟大成就,作出画龙点睛式概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成就,《决议》是这样概括的:“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伟大成就,《决议》是这样概括的:“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伟大成就,《决议》是这样概括的:“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成就,《决议》是这样概括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决议》对党在每个历史时期带领人民聚焦这一主题进行的奋斗得出了重要历史结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这四个历史性结论,反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螺旋式前进、渐进式发展的历史逻辑,每一步都蕴含着无数奋斗、牺牲和创造。正因为这百年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创造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创造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所以必将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样的自信确实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拥有足够的历史

积淀和现实底气。

**学习《决议》,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定力**

《决议》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成就时特别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决议》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的重大政治判断。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的选择,是民心所向。《决议》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高度评价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作出的卓越历史贡献。《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是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考验、斗争历练的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是赢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爱戴的人民领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路人。实践还将继

续证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全党就有定盘星,全国人民就有主心骨,中华“复兴”号巨轮就有掌舵者,全党同志面对惊涛骇浪就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深刻认识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关系前进道路方向、关系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进而在维护和拥戴核心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更加执着、更加忠诚。

拥有科学理论的政党,才拥有真理的力量;科学理论指导的事业,才拥有光明的前途。《决议》指出:“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概括和精准定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决议》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基础上,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精辟概括。历史已经证明且实践必将继续证明,我们党只有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互动的复杂背景下,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谋划事业发展、应对风险挑战,坚持正确前进方

向,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学习《决议》,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有利于进一步用好  
新时代积累的历史财富**

《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用较大篇幅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  
性成果,从13个方面分领域呈现出历史性的新  
气象。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  
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  
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  
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  
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在全面从严治  
党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  
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  
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  
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在经济建设上: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  
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  
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  
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  
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党不断推动全  
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  
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在政治建设  
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  
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  
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全面依法  
治国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  
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  
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  
著增强;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  
形势发生全

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建设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建立健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国防动员更加高效,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在外交工作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决议》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进行的一系列具有全局意义的伟大斗争作了阐述。针对一个时期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和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特别是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

断腕的勇气,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作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等重大决策;针对各方面体制机制深层弊端,坚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出制度建设,注重改革关联性和耦合性,真枪真刀推进改革;针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严重问题,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针对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底线任务,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上下同心、尽锐出战,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之难,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针对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适应我国“走出去”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不断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有力应对了一系列海外利益风险挑战。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强烈历史担当。《决议》还系统梳理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推出的重大举措、推进的重大工作,总结的许多经验做法都是值得珍惜、需要长期坚持的宝贵历史财富。

**学习《决议》,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有利于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方位**

《决议》以宏阔的视角,从五个方面总结党

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即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对党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的总结,实际上是精辟阐述了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深刻反映了党经过百年奋斗形成的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和对世界发展进步产生的积极影响,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更好把握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

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看——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党领导人民经过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让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关系看——中华民族是党生存发展之根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党领导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让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和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从中国共产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就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是为世界谋大同。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今天,我们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学习《决议》还能够更加深刻认识到,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主体,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学习《决议》,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历史智慧**

《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具体就是《决议》精辟概括的“十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个坚持”,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全党同志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历史智慧,推动历史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决议》对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学习《决议》,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更加深刻认识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更加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更加深刻认识到: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更加深刻认识到: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

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更加深刻认识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更加深刻认识到: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更加深刻认识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更加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更加深刻认识到: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系统阐述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一脉相承、相得益彰,贯通历史、现在、未来,为进一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供了重要指引。贯彻落实《决议》精神,从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中汲取历史智慧,我们一定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始终坚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



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坚持中国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始终坚持胸怀天下,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始终坚持开拓创新,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努力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始终坚持敢于斗争,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勇于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学习《决议》,深刻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有利于进一步洞悉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经历过一个世纪风云变化、严峻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必须善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科学研判和清醒认识当下国情、世情、党情,深刻洞悉历史发展大势,在繁重任务和严峻挑战面前始终掌握历史主动。

清醒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决议》强调,党“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明确断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而且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因为我们坚守的崇高理想、选择的正确道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因为我们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是因为我们历经百年奋斗和70多年建设积累,具有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物质条件和制度优势;是因为我们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拥有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是因为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直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决议》重申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安排,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当坚信,到那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清醒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一系列新的不确定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大变局的影响是广泛、深刻、持久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东升西降”的态势使得世界原有格局发生变化,导致出现新的不确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没有改变,但有的国家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缺乏足够的动力;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总之,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

清醒认识党带领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如《决议》指出:“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一定要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怎样才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考出好成绩?除要求全党同志始终保持清醒之外,《决议》在四段话中用“六个必须”明确了面向未来的重要要求,主要是强调这样“四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未来新征程上,确保党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指导离不开理论武装,要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指引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第二件大事,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未来新征程上,确保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第三件大事,就是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未来新征程上,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勇敢面对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坚决战胜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真正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得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做到难不住、压不垮,大胆地干、坚决地干、干出实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第四件大事,就是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未来新征程上,确保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源源不断培养造就爱国奉献、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激励鼓舞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前赴后继、接续奋斗。

(下转第39页)

#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明特质、 系统逻辑和强党功能

颜晓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创造了气壮山河的历史伟业,也形成了感天动地的伟大精神。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构成了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展现为系统的逻辑体系,提供了立党兴党强党的丰厚滋养。

##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

精神的历史基于实践的历史,又以独特的形态表征着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源于党的奋斗实践,反映党的性质宗旨,又成为党的最鲜明特征,塑造着一代代共产党人。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百年奋斗的精神结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的历史,也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构筑精神谱系的历史。百年来党推

动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一次次伟大飞跃,也形成了一系列精神硕果,党的征程上敢于斗争、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与璀璨夺目、激动人心的伟大精神相互辉映。精神的历史是实践的历史的反映和产物,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的革命历程的精神结晶。同时,精神的品格一旦形成,精神的能量一旦激活,又会产生强大的实践功能,转化为实践的成果和进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战胜艰难困苦、渡过危机险境、应对风险挑战、取得成功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党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执政时期,都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坚强战斗力的精神根源。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批先进分子接受并信奉了马克思主义,决心在中国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当时众多林立的政党中间,我们党人数很少,资源也没有,但却从一诞生便是一个立地顶天的政党。立地就是这个党肩负着人民的期望和民族的未来,顶天就是这个党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立志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决不谋取政党及其成员的私利。这就使党的初心使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产生之日起就站在了先进的起点和历史的高度上。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持续奋斗,创造了人类

社会发展史和中华民族进步史上的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与党的奋斗历程相统一的系列精神成果、与党的巨大成就相匹配的伟大精神丰碑、与党的性质宗旨相一致的先进精神品质。党在百年历史中创造的重大奇迹有多么瞩目,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就有多么璀璨;党在百年创业中经历的艰难险阻有多么不易,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就有多么珍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一路走来,脚步不停,留下了一个个大写的脚印,成为党的历史的显著标识、经典符号。百年征程上,有着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有着一步步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推向前进的重大胜利、成就和进展,还有着一个个灿若星辰、光照千秋的重大精神成果,同样成为百年征程的经典标识。党的精神谱系不仅成为党的奋斗历程的精神产物,而且成为精神符号,以精神成果的形式记录着百年来党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两个先锋队”的历史使命,浴血奋战、艰苦创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还要看到,我们党同时也为中华民族伟大飞跃贡献了丰厚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引领全体人民、全社会共同奋斗的精神激励,成为塑造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因素。中华文明连绵不绝,中华精神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忠实传承者,同时也是积极塑造者。积极塑造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深深融入民族精神的塑造过程,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高度。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的思想理论、性质宗旨、优良传统的鲜明体现

精神是主体的精神,精神的品格和特质是主体自身性质、发展、状况等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党的思想理论、性质

宗旨、优良传统等密切相关,是反映党的自身状况的一面镜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思想理论成为党不断取得成功和胜利的思想理论原因,成为党的根本性标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与精神强党密切相关。指导思想是党的精神旗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发展的历史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以其蕴含的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追求进步的时代精神、追求解放的革命精神,深深融入党的精神世界的塑造过程之中。党的精神世界又构成了党的思想理论的精神品格,使党的思想理论充盈着远大的理想、革命的激情、坚定的意志、高尚的情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党的思想理论相互映照、相互转化,学习党的思想理论,必须领悟蕴含其中的精神境界。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中体现出来的,是在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祛除自身肌体中不健康因素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牺牲、无私奉献、为民造福的模范行为中,在党的精神风貌、精神品质中体现出来的。党的精神成果通过生动、直观、感人的事迹,从精神层面的内涵展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从精神谱系的逻辑鲜明地揭示了党的性质和宗旨。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深刻内涵,准确地表明了一批中国先进分子创立的建党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精神符号。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优良传统,实质上就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之中的共同品质,是以优良传统的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优良传统,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得到充分展现。比如,在红岩精神中,支持共产党人宁死不屈、决不叛变的革命意志,是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在延安精神中,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内含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雷锋精神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古田会议精神中,坚决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树立起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纯洁作风;在抗美援朝精神中,志愿军不畏强敌、敢打必胜,彰显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在西柏坡精神中,“两个务必”的要求秉承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的精神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一个历经百年的大党,为何仍然能够保持勃勃生机,是由于百年来党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使党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党始终站在民族复兴的前列,走在中国人民的前面,“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推动伟大自我革命,党不间断地祛除自身肌体中的病灶和病毒,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旺盛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保持风华正茂的精神源泉。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全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精神准则。一个政党成为先进政党不容易,始终保持先进性更不容易;一个政党不谋私利、具有纯洁性不容易,始终立党为公、保持纯洁性更不容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精神表现,充盈着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精神品质。西柏坡精神就是在革命胜利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为全体党员和干部立起了一个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杆。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激励全党坚定信仰信念、增强革命斗志的精神动力。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血战湘江突重围”展陈时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红军是一支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才能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绝境重生,迸发出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居然成功了?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崇高理想信念支持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仅是党夺取革命和战争胜利的强大动力,而且也是建设、改革时期不懈奋斗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用党的一系列伟大精神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教育和激励全党,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也更加不易。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抵制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侵蚀的精神武器。在一个无产阶级数量较少的社会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在一个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无时不在的环境中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长期任务。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就是将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进步思想和高尚精神,注入党和军队成员的

心灵之中。当今世界,在两大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的较量中,在媒体传播力量空前增强的环境中,更加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强化全党的革命精神。

##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构成一个系统逻辑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百年历程中发展为一个丰富多样而又内在统一的精神体系,这一精神体系在党的新征程新实践中还将继续拓展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犹如一棵参天大树,有其根、干、枝、叶,主从分明、脉络清晰。全面把握这一结构体系的系统逻辑,是传承和弘扬党的一系列伟大精神的认识前提。

###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有其共同根源

精神产生于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产生于党的伟大奋斗历程。党的百年奋斗极不寻常、极为不易,革命和战争年代中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进行的,改革开放是在同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拉大的情况下开启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曲折的形势下坚定前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是需要激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越是需要依靠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战胜困难,越是需要用“钢少气多”打败“钢多气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精神品格,也是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培育和塑造出来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谈道,新来的俘虏兵“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引导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和发展,在实践基础上还有其共同的精神根源。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是党的整体还是个体,精神血脉中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民族之根。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深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英雄行为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情怀,深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心系人民的模范事迹中;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执着精神,深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坚定、不懈奋斗的攀登身影中。党的精神谱系植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源远流长、根深叶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百年来党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旗帜,马克思主义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高度,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科学之根,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厚根源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指明了前进方向,立起了科学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引领时代的精神,洞察时代发展潮流,站在时代发展前列,志在建立符合历史规律、反映人民利益的新制度新社会;是一种勇于革命的精神,运用“武器的批判”推翻旧世界,进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在斗争中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显著成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丰富的思想理论营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党的性质内在一致,“两个先锋队”的属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阶级之根和社会之根。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工人阶级特有的先进品质必然融入于该阶级先进政党的精神世界之中,工人阶级的精神品质也成为提升和塑造来自不同阶层党员的示

范和准则。工人阶级的精神品质,既有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广泛基础,同时自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来,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也有着引领和塑造的功能。我们党作为“两个先锋队”,必然具有先锋队精神,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基础和前提,只有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有资格和能力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才能具有先锋队精神。

##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党的历史共生同行

精神是历史的反映和产物,党的百年经历了苦难与辉煌、挫折与奋起、低潮与胜利,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也矗立起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和人类社会精神发展史上的精神丰碑。在党的每个历史时期,都将伟大社会革命和民族伟大复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大成果,从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发展轨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党开天辟地,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立志救国救民,诞生了走在时代前列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孕育出坚定理想、敢闯新路、艰苦奋斗、依靠群众的井冈山精神。进行前无古人的伟大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壮举,挺立起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不惜付出一切牺牲,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团结,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长征精神。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展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的遵义会议精神。担当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开展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升华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延安精神。做好夺取政权后的“赶考”准备,坚决防止革命胜利后贪图享受、斗志衰退的情绪增长,催生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西柏坡精神。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革命斗争,宁死不屈、对党忠诚,彰显了“在烈火中永生”的红岩精神。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美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危急局势,为了捍卫和平和我国主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毅然决然出兵朝鲜,进行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美援朝战争,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志愿军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革命忠诚精神、国际主义精神,显示了国威军威,立起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党带领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封锁、苏联撤回对我国援助的形势下发愤图强,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产生了以“两弹一星”精神为标志的新中国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部队官兵、各行各业人员,为了国家强大牺牲奉献、不计得失、勇攀高峰,显示了党和人民的铮铮铁骨。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形成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拓荒牛”成为特区精神的形象符号。在与1998年特大洪水的搏斗中,广大军民连续奋战、战胜洪灾,产生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举国上下开展了一场激动人心、感人泪下的伟大抗震救灾斗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抢险救灾、灾后重建,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后果危害大、影响范围广,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严

重威胁,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我国率先在世界上控制住疫情、率先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实现正增长,取得了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大精神成果,已成为在新征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摆脱贫困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梦想,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不懈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空前的决心和力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打响了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是党的性质宗旨的生动写照,是中国精神的充分彰显。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有层次、分类别、成体系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结构体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成就、历史任务中结出的精神硕果,每种精神成果都因其特定的时空场景和独特的实践内涵而呈现出具体的、特殊性,具有丰富性、多样性。领悟这些精神成果,要重温产生这一系列伟大精神的历史过程,把握特定的实践要求及其相应的精神品格。比如,琼崖革命精神就是以冯白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海岛坚定信仰、坚持斗争,坚守23年红旗不倒的革命精神。只有对那时的独特斗争环境感同身受,才能更深地感

受到这种精神的可贵可敬品质。同时也要看到,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统一的,相互包含、相互转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众多成果各具特色、生动形象,又有着贯通于全部精神成果的共同的普遍的精神品质。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所有成果中,都内含着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心系人民情怀、坚韧革命意志、永远奋斗精神、高尚道德情操等,都有将所有精神成果连接起来、统一起来的精神纽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普遍性存在于各个精神成果之中,党的精神成果的特殊性又证明着、彰显着党的伟大精神的共同品格。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结构体系是不同层次精神成果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硕果累累,又各居其位,有其自身定位。目前梳理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近百种精神成果中,都是在党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都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有着重要贡献,有其独特价值。同时也要明确,在所有精神成果中确有一批在党的精神发展史上有着更加重大意义、更加重大价值、更加重大影响、更加重大地位的精神成果。这些重大精神成果,在党的精神谱系中更具典型性、标志性、代表性、重要性,是我们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首先要关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的12种重大精神成果,就是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深入理解把握的精神成果,是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个纲。其他的重要精神成果,同样要一一学习领会,但都要放在与这些重大精神成果相关联的系统中来准确定位。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结构体系是各种类型精神成果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来自党的全部历史和实践,历史有多种表现方式,实践有多种实现形式,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结构体系也有多种载体和符号。党的历史很多情况是一段时间某个地



点成为重要发生地,这些地点承载着党的一段珍贵历史,产生的精神成果就以这些地点为载体或符号,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党的历史很多集中在重大事件上,这些重大事件构成了党的历史的关键事件、历史转折点,产生的精神成果就以这些重大事件为载体和符号,如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党的历史很多与重要会议密切相关,这些会议对于党的事业发展前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的精神成果就以这些重要会议为载体和符号,如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党的历史创造了无数重大成就,这些成就历经艰辛、来之不易,由此产生的精神成果就以这些重大成就为载体和符号,如“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特区精神等。党的历史的发生地不少是标志性地标,这些地标是一段历史的形象表述,用这些地标作为精神成果的载体和符号十分醒目,如红船精神、红岩精神等。党的历史是由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奋斗牺牲写就的,无数共产党人特别是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感人至深的事迹,构成了人格化的精神成果,如张思德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女排精神、援外医疗队精神等。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系统化逻辑化的精神成果,犹如一棵根深干壮、枝繁叶茂的大树,纹理清楚、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生机盎然,是一幅壮美而又有序的精神图谱。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的宝贵财富,是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的精神营养与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开启党的新的百年,进行新的伟大斗争,战胜新的重大风险,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党的伟大精神立党兴党强党的功能,建设强大政党,引领伟大复兴。

####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立党兴党强党的红色基因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具有崇高信仰的先进政党。百年来,党的红色基因一脉相承、从未改变。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是要让我们党不管走多远,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不要丢失党的精神血脉的红色基因,都不要让红色基因变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深含着党的红色基因,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是在立党兴党强党中始终保持党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些同志计较待遇的情绪,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久经风雨而不垮,更加朝气蓬勃,就是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强劲滋养。

立党兴党强党,要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多方面着力,同时要牢牢把握贯通党的各项建设的一条红线,这就是承载着红色基因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一个强大政党,首先精神上要强,精神强才能政党强。党的建设无论在任何领域、有什么侧重、用什么方法,离不开的、灵魂性的还是理想信念、初心使命、革命精神,都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在党的各项建设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能够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保证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把党建设成为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每个党员干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各种思想都在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思想,党员干部也经常面临着价值观的冲突,需要作出抉择。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是每个党员、干部的正确价值遵循。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立起了一整套精神准则,也就是在全党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通行什么准则,在党员干部的行为中遵循什么。比如,雷锋精神告诉我们,为人民服务是幸福,做好人好事是本分。焦裕禄精神告诉我们,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应该是为群众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是把心思放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是一次次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品格的锤炼。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新时代建设强大政党的精神引领

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革命胜利后、掌握政权后党内可能出现的与革命精神不相符的各种不良情绪,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要求。在执政70多年后,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保持革命者大无畏的奋斗精神,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强党方略。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只想做个安稳官、太平官,有的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患得患失、贪图名利,有的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凡此种种,都是立党兴党强党的思想和精神障碍,都要切实转变。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要从党的革命精神、红色传统百年来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充分认识其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但党的性质宗旨没有变、初心使命没有变、先锋作用没有变,仍然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党的旗帜下,接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革命精神、红色传统须臾不可丢。要从党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深刻内涵与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内在契合的,充分认识其深厚现实性。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但绝没有过时,也绝不会过时。完成新时代历史使命更加需要远大理想的激励,更加需要奋斗精神的激励,更加需要开拓创新的激荡。要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新的伟大斗争中的丰富发展,充分认识其实践引领性。伟大精神产生于伟大时代,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一个强大政党的显著标志,就是能够不断在新的实践中创造站在时代高度的新的精神成果,并且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精神引领。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更加重视精神强党,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强党功能。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强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的思想理论的精神支柱,在党的思想理论中充盈着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牺牲精神、人民情怀,使党的思想理论充满着浩然正气、阳刚之气。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强队伍组织。精神是人的精神,人无精神不立。党的队伍和各级组织是由无数共产党人组成的,他们的精神状态、精神境界决定着党的队伍的精神高度和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锻造广大党员和党的队伍的精神风骨。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强纪律作风。纪律松懈反映的是精神懈怠,作风松散反映的是精神萎靡。强纪律强作风,既要从强化规章制度着力,也要从强化精神支撑着力,有了自觉的精神尺度,就有了高度的自律行为。(下转第49页)

# 新型举国体制： 时代背景、基本特征与适用领域

谢宜泽 胡鞍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即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作为这一显著优势的集中体现,举国体制曾经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技攻关、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国取得当今发展成就的制度法宝之一。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曾在短时间内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以及在“一穷二白”的极低初始条件之下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在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民生工程和应急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也都是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生动写照。

然而,目前关于举国体制的认识,不仅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探索,而且还有不少人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不可否认,举国体制过去确实存在体制运行效率递减、聚合协同能力薄弱、市场和社会参与不足、多元综合功能发挥不畅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举国体制作为一种植根中国大地、彰显制度优势的组织协调机制,它并不简单地对应于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也不简单地对应于某个时代,它的存在显然有着更深刻的合理性。因此,当前的关键在于坚持制度自信的同时与时俱进,创

新举国体制的应用场景和实现方式。

那么,如何创新举国体制,将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四号探月工程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曾指明了一个方向,“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除此之外,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再次强调,“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人口健康、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量布局”。其中,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创新举国体制的发展目标,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基础工作,如何认识新型举国体制成为当下亟需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比如,为什么提出新型举国体制,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它与传统举国体制有什么异同,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应当如何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它的适用领域是什么?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进行探讨。

## 一、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背景

举国体制的做法早在农业社会时期便已存在,长城等军事防御工程以及京杭大运河等水利漕运工程即是典型案例。不过,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举国体制实践所必须的广泛社

会动员和分工协作存在着天然矛盾,因此,漫长农业社会时期的举国体制实践只零星地发生在大型工程修建等个别领域。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之后,生产资料私有制转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之相伴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也相应地发生改变,举国体制的普遍实践才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基础。当然,即便都发生在社会主义背景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举国体制实践也存在着明显区别。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属于计划经济占主导的时期,举国体制实践也附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特点;党的十八大之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举国体制实践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加以区别,可称前者为传统举国体制,目前正在形成且不断完善和创新的后者为新型举国体制。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之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时期,也是举国体制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磨合的时期,可称作是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的过渡期。

虽然举国体制的实践早已存在,不过,举国体制的概念却出现得较晚。有研究指出,“举国体制”一词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国家体委对我国优势体育项目迅速崛起的经验总结,尔后逐渐演化成为我国体育体制的代名词。除了在体育领域,科技创新、危机管理、超大规模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随后也出现了举国体制的提法。举国体制主要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给予政策倾斜、资源倾斜和精神支持,动员和运用全国财力、物力、人力达成国家既定目标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一方面继续肯定举国体制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提出新型举国体制的概念。2009年国家提出“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优势有机结合,探索健全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首次明确提出“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重要思想。为何此时国家如此重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除了它契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逻辑以及举国体制长期实践的历史逻辑之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它还契合时代发展的现实逻辑,即深刻反映了当前我国所处的严峻国际发展环境以及国家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因此,只有以国家竞争的国际视野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视野,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新型举国体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新型举国体制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效应对大国竞争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两股大趋势:一是以美国、英国等传统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北方国家加速衰落,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加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由南北大趋异走向南北大趋同。仅以中国和美国GDP(购买力平价法,2017年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为例,1990年中国和美国比重分别为3.16%和19.75%,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达到16.59个百分点;经过20余年的持续发展,2019年中国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17.36%,超出美国(15.81%)1.55个百分点。事实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经济舞台中心,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的国家。二是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生物技术、清洁能源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兴起,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已有研究指出,新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竞争格局,为后发国家的竞争与赶超提供窗口期。在两股历史趋势汇合的时代大潮之

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未来10年,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机遇千载难逢,稍纵即逝,能否抓住未来10年大有可为的时代机遇,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制高点,改变关键技术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的局面,实现整体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领跑世界科技前沿,进而在大国竞争中率先取得优势地位,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分叉口。因此,创新举国体制,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创新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我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引导资源和要素流向关乎国家竞争大局、国计民生事业的领域,是我国抢占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先机、应对国际力量演变和参与全球治理重塑的必然选择。

(二)新型举国体制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

当今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时期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启动阶段。在民族复兴伟业胜利在望之际,我国依旧长期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乡村振兴等系列难题。仅以乡村振兴为例,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下一步“三农”工作的重点。作为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继续推动农村繁荣发展的主导战略。然而,与脱贫攻坚类似,若要实现乡村产业、乡村人才、乡村文化、乡村生态和乡村组织的全面振兴,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传统村落保护、社会保障救助等,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或者慈善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必须继续发挥政府在对口帮扶、资金支持、土地规划、政策倾斜、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引领推动作用,动用全国力量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良好局面。总的来看,目前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前我国还面临着许多目标明确、不得不做、时间紧迫、必须自力更生而无法寄希望于他国、影响全国发展大局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大事,新型举国体制是解决当前特殊发展阶段众多难题的制度法宝。

## 二、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特征

新型举国体制是举国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从组织理论的视角可视之为一次组织域的变革。它不仅需要继承传统举国体制的优点,而且应当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赢主义经济全球化等时代大势(见表1)。

表1 传统举国体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运用领域

	传统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
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价值取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全体人民为中心
资源配置方式	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参与主体	政府、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政府、市场、企业、社会、个人等
外部环境	“冷战”两极格局、美国制裁封锁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运用领域	两弹一星、扫除文盲、防治传染病、重大灾害、重大基础设施等	前沿科技、民生工程、扶贫脱贫、军民融合、应急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国家重大项目和工程、竞技体育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新型举国体制传承传统举国体制的领导核心特征

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强大国家能力的体现,它根本上解决的就是“团结”的问题,或者说是在复杂环境下的网络协作问题。团结的首要现实问题就是由谁来领导和组织的问题。1949年之前的旧中国曾经长期处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状态,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整合广大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如今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和日趋复杂的国内环境面前,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坚定全国人民的信心,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具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权威和领导能力,进而统筹协调动员全国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使全国人民共同朝着一个目标持续奋进。因此,关于举国体制的领导和组织核心问题,新型举国体制和传统举国体制一脉相承。

(二)坚持人民至上是新型举国体制传承传统举国体制的价值取向特征

发展依靠人民的重要前提是发展必须为了人民、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两弹一星、月球探测等科技工程,南水北调、脱贫减贫等民生工程,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等应急工程,凡举国体制所办之事无一不是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密切相关。任何发展方式都是手段,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举国体制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举国体制的最终目的乃是举国受益,脱离了这一原则,任何形式的举国体制将丧失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对于举国体制办人民之大事这一根本性问题,无论是新型举国体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还是传统

举国体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是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充分展现。

(三)充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举国体制区别于传统举国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特征

改革开放之前,举国体制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指令,政策目标更多遵循的是政治逻辑。在特殊情况下,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国家甚至不时打破制度、常规和专业分际,强力动员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形成运动式治理特征。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过20余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新型举国体制必然要求突破传统举国体制以计划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政策目标上兼顾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更加尊重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市场规律。以举国体制的资源动员能力弥补市场机制的无秩序和盲目性短板,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弥补举国体制的弱激励和低效率短板,扬长避短,实现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优势互补。实践也表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两手合力优于市场一只手之力。因此,尊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是新型举国体制不同于传统举国体制最显著的特征。

(四)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力量是新型举国体制区别于传统举国体制的参与主体特征

传统举国体制的参与主体比较单一,主要是政府以及政府动员下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等个人。组织域的中心化程度很高,政府同时扮演了生产者、组织者和监管者的多重身份。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及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其

中,各类市场主体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49 万户,增长至 2020 年 7 月底的 1.32 亿户,增长了 269 倍。其中,企业 4110.9 万户,个体工商户 8834.8 万户。截至 2020 年底,各类社会组织总数达到 899759 个,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达到 2276 个。一言以蔽之,当前组织域结构逐渐走向分散,政府的网络协调成本大幅度增加。因此,在新形势下,新型举国体制必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组织域的适度去中心化,重点突出政府的核心职能,形成政府组织、市场生产、社会监督、个人参与等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参与格局,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新型举国体制区别于传统举国体制的外部环境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形成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因此,传统举国体制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展现了在极其艰难的特殊历史时期全国人民为保卫国家安全和政权独立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斗志和精神风貌。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剧变之后,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走向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我国融入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深和扩展。2009 年我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之后,2013 年进一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除此之外,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截至 2020 年底,已经得到全球 138 个国家和 31 个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成为逆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推动合作共赢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国内外要素合力显然优于国内单要素之力。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得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在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以打破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的瓶颈和制约,呈现出与传统举国体制不同的开放发展特征。

总而言之,新型举国体制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扬弃,是面向国家和人民重大战略需求,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等资源配置手段,凝聚各方力量以完成既定任务的一种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在领导力量和价值取向等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方面,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一脉相承;在资源配置方式、参与主体和外部环境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进行适应性变革,呈现出与传统举国体制不同的时代特征。

### 三、新型举国体制的适用领域

新型举国体制是成就中国现代化伟业的国之利器,是强大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的有机结合。新时代我们在坚持和发扬它的同时,还必须特别重视对方向和边界的合理把握。已有研究指出,举国体制虽在理论上拥有一般协作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属性,但它并非适用于所有治理领域,正确识别它的应用对象是其决策重点和成功前提。依本文之见,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制度安排,主要解决的是市场经济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主要提供的是具有巨大外部性、巨国规模效应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尖端性、长远性、公益性和重大性公共产品,它主要适用于以下领域。

#### (一)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沿科技领域

当前国家竞争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科技竞争,科技创新能力不仅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能力,更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能力。然而,随着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源投入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前沿科技创新早已不是凭借某个个人或独立机构可以完成的事业,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从科技发展规律来看,二战后科技发展模式逐渐从传统欧洲式的“自由探索”模式演变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大科学工程”模式与以市场为主体的“需求牵引”模式相结合。从各国科技发展实践来看,许多人或许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发展型国家才有举国体制,而宣扬分权制衡和新

自由主义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举国体制。事实并非如此,在航天航空方面,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机构设置。为了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因此,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当前必须牢牢掌握科技创新的主动权,以新型举国体制构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国家科技发展体系,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积极引入民间资本探索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战略必争领域打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 (二) 涉及普惠兜底性质的民生工程领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教育、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民生工程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根据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市场社会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运动以扩展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社会保护运动以防止经济脱嵌。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保护脆弱的个体免遭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侵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关键是以国家的力量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针对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举国体制的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开展扫盲运动、迅速降低文盲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各类传染病、推行农村医疗合作、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等方面,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人口红利、健康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民生问题的解决假若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补救

不仅不会得到弥合反而可能会有所扩大,只有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积极作用,创新举国体制的形式,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相对高效地补齐重大民生短板,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 (三) 涉及国家国防安全的军民融合领域

国防安全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它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使得国家成为国防安全的天然垄断者和唯一供给者。何虎生认为,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与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不过,从国际比较看,相对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而言,国防实力还显不足,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强军目标,要求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有效地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努力走出一条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军民深度融合之路。那么,如何实现军民之间的深度融合?关键是利用独特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效整合军队和市场的力量,打破军用系统和民用系统相互封闭的隔离状态,促进科技系统、经济系统和军事系统的跨区域跨领域协同合作,形成“军转民”、“民参军”和“军民通用”的军民融合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战略支援部队时特别指出:“要扭住军民融合不放松,善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新型举国体制在军民融合领域不仅应当有所作为,而且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从而在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之下,推动新时代强国强军目标更快更好地实现。

#### (四) 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应急管理领域

偶然性和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是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直接威胁,它们具有高度危险性、高度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完



整、不准确、不及时等特点,与它们的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无数的实践证明,举国体制是独具中国特色并行之有效的应急管理手段。仅以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史无前例,属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发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正是依靠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迅速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部门协调、专业救治的“全政府—全社会”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防疫模式。举全国之力对口支援湖北和武汉防疫工作,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不仅以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促使疫情防控形势向积极向好的态势转变,而且还为世界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争取了时间和积累了经验。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为了统筹推进经济建设,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家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逆周期调节措施,全力支持和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有序复工复产。事实一再表明,举国体制在短时间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性灾害事故方面具有制度优势,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降低原生或次生灾害损失。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升级,它理所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在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中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五) 涉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绿色发展是中国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实践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举国受益的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方面。以三北防护林工程为例,它从1978年开始启动,计划持续至2050年,覆盖北方13个省级单位,建设总面积407万平方公里。目

前三北工程已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014.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5.05%提高到13.57%,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植树工程。在诸多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的共同作用下,201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2.96%,比1978年(12.7%)提高了10.26个百分点。不过,从世界范围看,人均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依然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绿色发展之路任重道远。针对绿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为了顺应绿色工业革命的世界趋势,寻求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在全局性、基础性、公益性的生态工程建设方面,借鉴历史经验,依然可以合理地采用新型举国体制模式,协同住建、交通、水利、教育、气象等系统,广泛吸收“蚂蚁森林”项目、腾讯和京东网络募捐平台等社会力量,在全社会倡导绿色低碳理念,实现绿色发展、绿色投资、绿色消费、绿色创新,为下一个5年乃至未来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态永续发展夯实基础。

(六) 涉及体育强国目标的竞技体育领域

体育强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女排代表时曾指出:“实现体育强国目标,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举国体制的概念最早出自于竞技体育领域,竞技体育也是举国体制运用最充分、最系统、最悠久、最成功的领域之一。我国参加的历届亚运会、奥运会等国际体育竞技赛事证明,举国体制在为国争光、振奋民族自信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英国过去20多年的奥运历程也充分说明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价值。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英国仅摘得一枚金牌,世界排名第36位,处于历史最低位次。次年英国以财政拨款和博彩基金为资金支持成立国家级的高水准体育管理机构,即英国体育协

会(UK Sport),将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动员全民力量发展竞技体育项目。在随后的悉尼、雅典、北京、伦敦和里约奥运会,英国竞技体育实现重大突破,分别取得11枚(第10位)、9枚(第10位)、19枚(第4位)、29枚(第3位)、27枚(第2位)金牌,英国竞技体育的巨大成功也带动了群众体育的推广和普及。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钟秉枢认为,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至少可以在体教融合、全民健身、科学训练、大型赛事举办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未来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和国际经验,遵循体育运动的客观发展规律,以重大体育赛事为契机,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竞技体育发展,通过竞技体育带动校园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 四、结语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关于举国体制的实践,它早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就已经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后,凭借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制度优势,在科技发展、民生改善和国防建设等方面,举国体制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对于人口规模巨大和国土面积广袤的“广土巨族”而言,举国体制可谓是极富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和治国智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渠道,也是在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方面可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举国体制的认识,理论界的讨论却大都停留在竞技体育领域,不仅落后于现实丰富实践的需要,甚至陷入了对举国体制的认识误区。事实证明,举国体制仍然没有过时,举国体制过去的弊端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没有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受制于所处的特殊时代,缺乏对市场的有效运用和对边界的合理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举国体制的概

念,对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及其取得的实际效果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并提出了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任务,赋予了举国体制新的时代内涵。

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转型升级,它不仅契合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和长期实践的历史逻辑,还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现实逻辑。在领导力量和价值取向方面,新型举国体制继承了传统举国体制的优良基因;在资源配置、参与主体和开放发展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转变,又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举国体制的重要特征。简言之,新型举国体制的“新型”最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市场化、参与主体多元化和外部环境开放化方面。在当今国家竞争日益加剧和民族复兴胜利在望的关键时期,在理论层面,应当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站在大国竞争的国际格局和民族复兴的历史纵深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价值和独特优势;在实践层面,应当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主动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涉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前沿科技、民生改善、军民融合、应急管理、重大生态工程以及竞技体育等领域,应当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积极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21年第10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谢宜泽,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 中国人权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

赵永华 刘娟

鉴于中国在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上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差异,西方国家多从国家利益、政治偏向和普遍性角度对中国人权进行批评和干预,中国有必要主动回应,以中国方式传播中国特色人权。目前,关于中国人权话语和传播的研究文献主要来自中国学者,国外学者对这一话题关注较少。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体系培育、话语权建构和具体的人权话语文本分析等层面,专门探讨中国人权国际传播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往往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角度,从规则制定等路径展开分析,或者结合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进行探讨,缺乏从跨文化传播、中西方文化差异角度对中国人权国际传播进行的研究。国外学者虽然对中国如何传播人权不感兴趣,但对中国人权却有较多研究,主要是:中西方人权理论和人权概念的比较、中国人权与其他议题的关系、西方媒体关于中国人权的报道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批评中国人权,主要缘于西方媒体惯有的新闻批评文化和中国国力上升给西方带来的威胁。西方学者带着焦虑的情绪将中国人权议题与中国追求软实力、参与全球治理、争夺国际话语权等议题放置在一起,并显现出西方学术话语的霸权底色。在他们看来,中国越是强调人权应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就越是背离国际人权标准。中国对人权的解释非但没有提升中国人权话语的正当性,反而成为西方学者给中国人权扣上违反“普遍性”人权帽子的理由,体现出对中国人权集体不认

同的基调。

在西方学者、媒体、政府合力构筑的人权话语霸权下进行中国人权话语建构和国际传播,必须回答以下问题:第一,西方人权话语霸权的实质和内在生成逻辑是什么,有何缺陷;第二,中国人权话语传播什么,是否具备了有关人权的自主话语;第三,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应该采取怎样的传播措施,包括如何建立合理的话语秩序,怎样与西方互动,以何种方式言说。

## 一、西方人权话语霸权的非合理性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借助联合国等国际平台和机制,将西方人权提升为全球人权标准,形成话语霸权,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显然,西方的人权话语并不能解释和回答中国人权发展的诸多问题,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理解必须放置于中国自身的现实语境中。然而,西方人权话语霸权是中国人权国际传播绕不过去的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对其本质和缺陷的认识尤为必要。

### (一)西方人权话语霸权的本质

话语是演讲、书写构成的相关陈述体系,通过语言进行知识生产和意义生产从而对社会实践产生真实影响和效果。人权话语作为与人权相关的陈述体系和意义生产,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对纳粹暴政的反思,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欧美人权话语模式。

西方国家借助国际组织形塑了人权话语的权力、等级和能力分配,构建了人权话语的言说方式,确定了人权话语的边界,确立了人权话语霸权,进而对差异性和异质性人权话语进行管控,且从国家利益和政治目的出发,以“普遍性”人权价值观为名,利用联合国等平台批评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歪曲攻击,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制度偏见’,肆意炒作一些极端的人权个案,无理指责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政策。”美国倡导“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以人权普适性为借口对中国内政外交指手画脚,以人权为名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人权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政治工具。2019年底美国国会相继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20年初正当中国人民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时,美国媒体指责中国的防疫措施“侵犯人权”,某些国家还出现了针对中国和华人的歧视性言行,颠覆了平等、不歧视的人权价值观。美国政客和媒体将人权议题作为攻击中国的符号工具,中国人权屡遭西方话语霸权的“污名化”。

出于国际战略部署的需要,美国政府将人权视为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并将人权与商业利益和政治目的结合起来。老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时曾指出:要想取得商业上的利益,任何人都会更加重视人权。2000年美国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监控中国各个方面的人权状况,包括宗教自由、工人权利、民主管理的权利、知识产权、政治犯的待遇、西藏的权利和台湾的民主等,这些人权内容与美国的商业利益、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因此,对人权问题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将其视为西方人权全球化和普遍化的结果层面,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实现人的尊严和幸福生活的公民权利问题,而应认识到这是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贸等纠缠在一起的问题。

## (二)西方人权话语的散溢化与普遍性人权话语的缺陷

传统人权话语围绕欧洲中心和国家中心逻辑展开,现代人权话语包罗万象,呈现散溢化(discursively)特征,并逐渐由NGO(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协商形成,人权话语呈现多元化趋势。地方人权话语而非西方人权话语更具有意义,人权话语走向地方自我裁决。国际人权话语的主导者——西方国家的人权话语,如今只能在服务于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利益的话语中找到。

阿根廷法学家爱德华多·拉博西(Eduardo Rabossi)认为人权话语的普遍性与人权实践的具体语境相冲突,在现实世界中,推动普遍性人权话语落地面临诸多困难。在这个意义上,人权话语成为抽象的存在,很难将其落实到具体语境中。人权话语的全球化 and 普遍化进程并非伴随着人权话语的同质化和统一化,其中包含着矛盾性和自反性。因此,要警惕人权被西方国家以普遍性之名,以区分人性和非人性,从而获得西方人权话语的全球霸权。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的价值观、秩序观、体系观自成一格,中西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差异、冲突和隔阂由此变得更加深刻,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两者在各自不同轨道上自我演进。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种体系有了正式的正面互动。但是,这种互动对西方而言是主动,对中国而言则是被动。”世界互动秩序延续至今,然而,信息全球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将各国之间的距离历史性地拉近,使得共建全球新秩序的必要性在扩大。

在全球新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渐提升。与此相应,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标志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正在从“规则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一方面,西方人权话语自身带有缺陷,例如普遍

性人权观的不切实际,以及现代人权话语的多元化趋势对传统话语造成冲击,为打破西方历史形成的人权话语霸权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变化,面对西方的人权指责,打破西方话语霸权、重塑人权话语秩序,成为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新秩序的应有之义。

## 二、以发展权确立中国人权话语主体性,更新人权话语体系

全球化将 20 世纪之前的海洋变成了“内海”,开始了“全球律则”时代,在方法论上讲,欧洲资本主义在海洋内海化过程中通过对无限性的消解和“祛魅”,以理性建构的方式,给世界强加一套规则体系。显然,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的强权是建立在中国缺乏主体性和不自信的结合体之上的,将中国主体性塑造成西方投射政治想象的载体”,因此中国人权话语建构,首先要确立中国人权话语的主体性,这关涉突围西方话语霸权的核心问题:如何成为世界人权理念的主要输出者。

中国和西方世界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双方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缺乏充分有效的融通和对接。因此,面对西方人权话语霸权,“我们需要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但是这个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他人的要素”,我们要有自己的世界视野和关于世界普遍性的辩解,不是民族主义,不是把中国和西方对接,而是以另一种普遍性和现在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普遍性进行对话,突破二元对立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从中国立场出发,具有世界眼光。历史上,美国话语霸权确立的根本,在于其一方面挖掘自己的本土文化,与欧洲拉开距离,另一方面在与欧洲对话和交融中将自身价值进行输出。鉴于此,中国在确立人权话语主体性过程中,既要参照普遍性人权话语,也要考量自身特性,以包容和开放思维,全力挖掘中西文化中关于人权的价值共性、文化共性、道德共性,推动本土原创概念和特殊概念的国际表达,更新

人权话语体系。

人权话语体系,是人权理论、人权观点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紧密相关,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人权诉求,对人权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同。人权话语无论是在概念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无法脱离具体语境而存在,因此,不能也不应将某些国家的人权标准绝对化,要求所有国家遵照执行。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权的主要内容,区别于西方从“天赋人权”和“人人乃上帝子民”等角度阐发的人权话语。

1991 年中国发布第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突出人民的生存权。发展至今,白皮书作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侧重点也由生存权转向发展权。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是以概念人权到制度人权再到文化人权为基础,构建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人权理论、观点和思想。将发展权作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不仅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即必须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作为促进其他各项人权实现的保障,而且也是对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的超越。发展权不是对西方人权话语的抛弃,而是将发展权提升至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位置,并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实现发展权的支持性权利,以此确定中国特色人权话语意义来源的统一性以及言说的方法体系和命名体系,建构统一连贯且有体系的话语组合,从而对全球人权话语进行完善和补充。

2017 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4 次会议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纳入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会议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的“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等理念作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思想支撑。习近平在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中提出:“以合作促发展,以

发展促人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年来,中国坚持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开放对话姿态,与全世界共享中国人权建设经验,就国际社会关注的人权问题,积极发表中国观点,尤其是“中国以‘不干涉内政’‘创造性介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超越西方人权观,赋予人权话语以更多的中国元素,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 三、以制度方式成为人权规则制定者,确立人权话语秩序

西方人权话语霸权遵循着“理念—规则—机制—实施”的生成路径,首先以《联合国宪章》进行理念输出和理论供给,然后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机制进行规则制定和规则解释,再通过人权机构实施监督和设置议题。

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关涉的是理念输出,理念是话语权的基础,进一步循着“规则—机制—实施”的路径才能生成话语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英、美、苏等26国的倡导下,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逐渐成为抵抗法西斯势力的重要思想武器,随后西方国家对人权侵权行为进行了反思,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1条规定将尊重人权确定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1946年成立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48年通过了国际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话语权的规则保障,基本上确定了国际人权规范发展的谱系,借此完成了人权从理念输出到制度建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不仅主导了人权理念和标准的制定,还主导了国际人权机制的建立和规则的运行,掌握了法律优势、人力优势(尤其是规则制定和文件起草等关键岗位的人力优势)和监督优势,以法官和监督者的角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议题进行点名和羞辱,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话语劣势。

因此,中国若想彻底改变在人权领域的言语弱势和话语劣势,需要从根本层面入手,以制度形式参与国际人权话语秩序的建立:切入

世界人权规则的制定者圈层,主动提供人权问题的应对方案、规范,在成为人权理念输出者的同时,成为人权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通过身影的出现,就可获得话语权,各色形式的话语公关,暴露着自身的迷茫、不适应、焦灼和不自信的自以为是”。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不能停留在身影层面,而是要上升到制度层面,参与确立合理的人权话语秩序。

人权话语秩序需要在一定的规则、程序和规范内确立,“话语的秩序由一系列的约束规则构成:话语的外部规则、话语的内部规则以及话语主体的使用规则”。中国日渐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以制度方式确立人权话语秩序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可能性需要与现实结合。在西方人权话语霸权下,西方人权机构主导着人权标准和规范的制定,意味着中国需要在西方既定标准内进行人权话语和秩序的建构。在国际范围内,通常国家会通过参考规范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以辩论、阐述和劝服等话语策略介入国际人权机构对人权规范的制定。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组织和国际议题仍以规则作为“绑在其背后的推手”来处理问题。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来看,全球议题的处理一靠大国、二靠平台、三靠规则,其中规则是合作机制的重要保障。积极参与国际人权规则制定有助于重构话语秩序,增强中国在国际人权话语场域内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发展权”形成对国际人权规范的竞争性解释,去除西方人权话语霸权带来的制度成本和制度束缚。

### 四、在与西方人权话语对话和互动中,实现人权话语认同

在多元文化格局中,进行人权话语对话,需要面对文化差异问题。在尊重东西方人权思想、历史和现实差异的基础上,主动传播中国特色人权,既要承认人权作为人类共同理想

和价值准则的普遍性权利属性,同时也要强调人权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文化传统,从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角度消解西方国家的人权偏见。“让中国文化以自身的历史价值、伦理哲学、现实连续性展开,而不是被强行纳入一种西方强势的话语和思想体系中”,以文化自主和自信打破西方话语背后隐含的单一性和压抑性。

强调中国特色人权话语,并非刻意强调它的特殊性,而是在与西方人权话语的对话和互动中,在与普遍性人权话语的联系中,争取建构自主话语。中国人权话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在与其他人权话语的复杂互动关系中,并将其他话语带入自己的意义之网,确定人权话语言说的领域和范围,提供人权话语新的意义和认同的来源。

关于话语和认同之间的关系,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是一种与主体有关的话语,内含着认同,与规范内在化区分开来。因此,人权话语传播的起点是认同的构建,并非从外部强制灌输和强迫他人接受,而是他人主动的内化和接受,这取决于话语主体及其话语在多大程度被主动认可和承认。如果他者认同话语主体,会主动将自己塑造成支持者而非对抗者。

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主体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交往活动中的协调、理解关系达成一种有关社会规范体系的理解,形成交往理性和规范共识。中国人权话语的建构与传播,需要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哈贝马斯的“话语中的权力”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关注人权话语权力关系网,思考权力关系网由哪些不同主体组成,不同主体之间存在何种互动和博弈关系,有着怎样的人权话语结构,进而分析中国人权话语的传播存在怎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具体微观且策略性的层面入手,在交往活动中构建规范共识和意义共享,“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构建

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实现与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互联互通’”。

这种“互联互通”首先取决于互动的可能性,没有互动,就无意义共享,也无法实现规范共识和认同的获得。由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具有理想化特征,对处于互动关系中的话语主体要求较高,而在国际利益博弈和政治力量失衡的话语场域内,审议性讨论和交往理性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由此,在国际话语场域内,中国要实现人权话语的意义共享和规范认同,构建人权话语共同体,就不能是人权内在秩序和意义内涵的简单重复,而应围绕人权话语秩序的形塑展开策略性对话与合作,这一过程包含以下四个步骤:第一,采纳和战略性谈判过程;第二,道德意识提高,辩论、对话和说服的过程;第三,制度化和惯习形成的过程;第四,认同和行为规范的内化与制度化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需要借助具体的对话机制和意义生产机制来实现意义共享,适时择机展开不同人权议题的对话交流。但是,由于我们“急于与欧美平行的运行系统和机制进行对话,往往由于过于明确的利益指向和价值诉求而流于空谈,由于缺乏微观的切入和从实际问题出发的思考,从而为实践者注入虚妄的幻想”。人权对话需要的是:基于对现实人权问题的思考,提供一种真实的有关对错的人权话语,从而为国际社会提供有关人权的思维范式和言说范围,逐渐形成人权话语共同体和话语联盟。

“信任与说服,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思想或情感过程,这一过程在关系中确立,通过说服、议程建构和吸引力等同化方式来影响他人,塑造他人最初的行为偏好,进而实现价值认同。”有关人权的价值认同产生于互动和关联中,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要锁定他国具体的言说对象,即受众,要“明确价值观和利益观的目标,列出可以明确言说的对象和可以利用的资源目录,评估言说对象的目标和偏好,选

择可行的言说策略”,进行针对性传播,从而实现国际社会的话语认同,破解西方人权话语的污名化。

### 五、以共享文化破解西方话语的污名化,讲好中国人权故事

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受损的身份”概念,用于描述遭受污名体验的各类社会越轨者在其他人眼中被贬低和被贴标签的社会现象。西方一些国家站在自身立场上对中国人权进行指责和贬损,常以消极、冲突、专制和不平等的思维看待中国人权,凭借话语霸权进行“污名化”,以西方人权优越论区隔和贬低中国人权。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人权时多使用 concern(担忧)、abuse(滥用)、violation(违背)、terrible(恐怖)、shortcoming(缺陷)、questionable(有问题的)、ruthless(无情的)等词汇,并将中国人权与战争、身体部位、自然现象、动物、儿童、妇女等话题连接起来。有学者总结得出西方对中国人权实施污名化的议题偏好包括:异见人士议题、民族宗教问题(主要是新疆、西藏、宗教自由等)、国际/海外议题、社会发展问题、法治议题,等等。“推动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政治化’(如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政治主权问题‘人权化’(如西藏问题)”是西方的惯常做法,以此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偏见。

目前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是“西强我弱”。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我国突围话语权困境的基本策略。讲故事并不简单,是给周围世界和生活赋予意义和秩序的过程。好的故事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可以确立归属感,组织人类经验,形成集体记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近年来,中国为“讲好中国故事”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为什么效果却不如人意?

中国向世界讲述的人权故事存在什么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致力于讲述中国在人权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讲述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实际上,中国人权话语劣势并非源自传播技术的薄弱和话语数量的不足,而是在讲故事时出现了思维误区和视野偏差,缺少世界主体性意识,只讲跟中国有关的人权故事而较少考虑世界普遍问题。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有内容上的创新,更要有思维和视野上的转换,贯通中国与世界:在世界中思考中国,在中国思考世界。世界主体性意识在于思考如何通过中国的努力,解决世界普遍存在的人权问题,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讲述中国人权故事离不开对世界其他国家故事逻辑和文化特色的了解,不同的新闻文化会产生不同的人权故事框架。了解受众的故事主题偏好,尔后进行定制传播,使用隐喻、典故和事例,激发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阻碍国外受众接受中国人权故事的并非是信息的不畅,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固有偏见。将故事嵌入传播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关照个人视角、普通人的价值观和日常生活,在公众话语中进行转换,才能讲好中国人权故事。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认为,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更多的是准确地回应传播对象,而不是正确地传播信息,关键在于理解对方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理解这种语境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价值体系——包括种族认知、行为规范、信仰、审美标准、思维模式和交流方式等,这些都是特定群体为确保生存而逐渐形成的,传播对象以他们既有的思维模式、情感结构和行为方式来解读故事。



传播关乎文化,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将信仰共享作为传播仪式观的核心,可见传播的起源及其最高境界并非是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是共享信仰的创造、表征和庆典,将人们以共同体或团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这启示我们,讲故事的终极目标是要营造一种共享的信仰,创造一种共享的文化,要寻找到与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弥合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鸿沟。

总体上,讲好中国人权故事,要注意几点:一是要在传播对象的“文化地图”上寻找到合适的经纬线和坐标,精心选择能够在不同政治体系和文化主体之间达成互惠性理解的故事,选择人类普遍关注的人性、人道、人爱等主题,将人权话题转化为有意义且容易掌握的故事;二是要讲述真实可信的故事:既要有宏大叙事,也要有微观叙事,以具体的小故事回应宏观的大战略,将人权故事与普通老百姓及其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真实个体在实际生活中与人权相关的际遇和情节;三是要以传播对象易于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人权故事,充分考虑对方的信息需求和语言习惯,从而产生意义共享,形成积极正面的集体记忆;四是要将人权故事的讲述当作共识获取的过程,其中传递的价值观要符合传播对象的文化和世界观,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以文化间性和文化包容诉诸情感认同,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人权故事讲述作为一种新闻生产,不是填补信息空缺的工具性存在,而是将离散的事件转化为如詹姆斯·凯瑞所说的有意义的共享文化和信仰的叙述过程。如果没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支撑,人权故事的国际传播就只会是一

系列数字、模式和事件的堆砌。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目前我国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是由于“话语权长期受制于人,挨骂问题仍有待解决,这一点在人权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本文回答了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乎语境:中国人权话语处在何种话语场内,如何认识西方话语霸权的本质以及目前遭到的反抗,我们需要认清问题、困难和挑战。第二个问题关乎话语内容层面,更关乎传播自主性和理论准备层面,强调对西方人权理念和知识体系的解构与重构,这样才不至于在面对西方的指责和批评时,陷入“哑口无言、词穷理亏和词不达意”的困境。第三个问题关涉传播方式,在廓清西方人权话语霸权本质和做好自身理论准备的前提下,还要思考作为抽象理论的人权话语体系如何付诸话语实践,这关乎中国人权话语权的生成路径,须从根本层面入手,通过参与制定规则以制度的方式重构人权话语秩序;从话语策略来讲,用讲故事的方式以共享文化化解西方的人权偏见,二者都以构建认同为起点强调与西方的对话与互动。上述三个问题构成了本文论述的逻辑,也是中国建构人权话语并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取得制度性人权话语权的关键。

总而言之,国际人权话语权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并不存在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的策略。具体而微的话语策略还需回归新闻传播、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综合领域内,回到切切实实的人权话语实践中去摸索、提高和凝练。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赵永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 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现状、展望及发展策略

田原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总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随着进入后疫情时代,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出总体规模快速增长、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绿色投资合作不断深化、重点区域合作增减、对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互现等特点。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一些地区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对外投资合作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在世界各国先后出台碳中和战略、我国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加快推进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对助力全球经济疫后绿色复苏、实现国内国际循环融合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一、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发展现状

### (一) 总体规模恢复增长态势

当前,对外投资合作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但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力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逐渐从疫情阴霾中走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对外直接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三大板块同比增长均超过10个百分点,对外投资合作整体实现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上半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投资总额达到713.5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比2019年同期增长10.2%。其中,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539亿美元,同比增长4.7%(见图1)。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上半年,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4397.6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2.2%,比2019年同期下降3.3%(见图2)。劳务合

作方面,上半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5.9万人,同比增长19.5%,较上年同期增加2.6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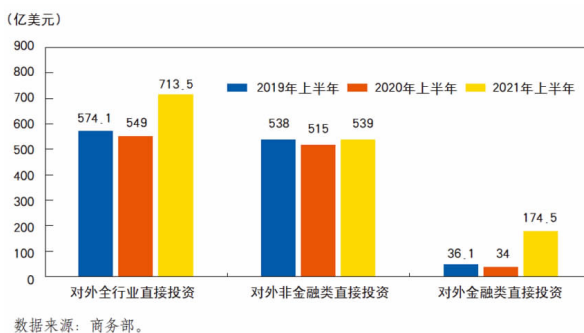


图1 2021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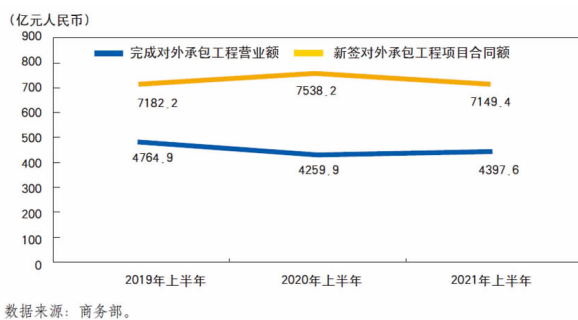


图2 2021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统计情况

### (二) 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今年上半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成为我国对外投资最具潜力板块。投资规模方面,“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前30名的1/2以上,其中新加坡、印尼、越南、老挝和马来西亚排名前五。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393.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7.9%,同比增长10.6%,比2019年同期增长2%。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2508份,新签合同额592.9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3.7%。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雅万高铁、圣克鲁斯水电站、柬埔寨暹粒国际机场项目等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有序实施,示范效应不断增强,一批民生项目为东道国民众带来明显获得感。在40个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上缴东道国税费超5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7万个就业岗位。

### (三)绿色投资合作不断深化

随着疫后经济绿色复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我国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领域合作加快发展,一批新能源企业加速全球布局。据机电商会统计,2020年我国签署境外风电项目为45个,项目金额为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光伏项目为117个,项目金额为99.9亿美元,同比增长145.0%。我国在阿联酋、黑山等国推进实施了一批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如迪拜光热光伏混合发电等,加速所在国能源绿色转型进程,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持续贡献中国力量。同时,各国对我国绿色投资合作的需求持续增长,投资合作空间广阔。多个国家表达了与我国深化绿色发展领域合作的意愿。如希腊、匈牙利等国政府期待我国新能源头部企业在中东欧地区加大投资。

### (四)重点区域合作增减互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对部分区域的投资合作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是东盟与我国合作逆势增长。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累计对东盟投资超过1700亿美元,东盟作为我国第一大投资目的地的地位稳固。1—4月,我国前十大对外投资目的地中东盟国家占4个(新加坡、印尼、越南和马来西亚);我国企业在东盟签署工程承包合同额达213亿美元,同比增长51.7%,在越南等国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增速超过两位数。二是我国对非合作保持稳定。1—4月,我国对非直接投资12.59亿美元(非金融类),对非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04.8

亿美元,在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中的份额保持不变。三是我国与南亚合作需求受到抑制。工程项目进展迟滞,2020年我国对南亚国家全行业直接投资为8.3亿美元,下降59.8%。其中,斯里兰卡等国降幅超过80%,对印度投资下降15.7%。

### (五)对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

当前,我国对外投资质量不断提升。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依托技术创新、运营管理等综合优势,加快转向高技术含量工程。2020年,我国先后完成巴西美丽山水电站、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项目。第三方市场合作发展势头良好,例如,中国交建与英国公司Atkins就蒙内铁路项目开展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共赢发展。部分工程企业还通过收购产业链方式,提升国际竞争力。对外劳务合作方面,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员主要分布在新加坡、日本、阿根廷等,我国对外劳务合作重要市场的地位日益巩固。外派人员结构不断优化,逐渐尝试输出部分专业人员。

## 二、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影响因素

### (一)世界经济疫后复苏仍面临不确定性

全球抗疫取得了一定进展,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仍面临许多挑战。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警,如果出现抗药性的新病毒或疫苗安全风险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疫情可能会拖得更久,全球经济可能再度恶化。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相继推出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采取不同程度的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金融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加剧了主权债务风险,全球有可能出现新一轮债务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受到冲击。疫情和大国竞争等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格局,国际经济“失序”甚至“无序”风险上升,复苏前景堪忧。

### (二)全球面临安全和开放的两难选择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世界各国重新思

考安全观和世界观,对外经济合作更加倾向于保障安全。受此影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发展,特别是受中美贸易摩擦由冷变热,由局部到全面,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和供应链安全不断受到影响,冲击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机制。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发达国家与我国的国际投资政策也趋于谨慎。目前,在新能源汽车、5G、互联网等先进技术领域,随着我国越来越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和高科技制造业竞争,可能打破美日欧长期垄断高科技产业主导全球制造业分工的基本格局。在安全与开放的两难选择下,全球进入竞争格局重塑期,对企业“走出去”的时机把握和战略决策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对外投资合作需要随着局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深入推进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革命性变革推动新工业革命到来。大数据、深度学习、无人驾驶汽车、量子通讯等前沿科技加快产业化进程。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新一轮创新浪潮与新工业革命深度交互,创造出一大批新的产业部门和产业模式,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大大拓展了对外投资的新兴领域,也加剧了国际投资竞争,对高新技术领域投资合作提出新要求。新一轮科技革命打破产业边界,在生产、连接、商业、合作等领域出现了产业深度融合趋势,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融合引发产业链供应链变革,加快打破传统的国际竞争格局,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拓展更加广阔领域。

#### (四)世界各国纷纷加快碳中和进程

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碳中和目标和近远期行动方案,并将其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推动力。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主席对世界的承

诺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指明了方向,同时,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这就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合作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经济普遍受到重创,为推动经济尽快复苏,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推动碳中和为由加快推进碳边境调节机制,提出对部分产品征收碳关税等措施,并拟付诸实践。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当前碳排放第一大国,碳关税落地将对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 (五)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任重道远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出的,具有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对外投资合作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环节,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肩负着重要责任。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 三、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前景展望

#### (一)对外投资合作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后疫情时代,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内外部诉求仍然强烈,对外投资合作将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一方面,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同比增加3.3%,增速远超全球FDI(国际直接投资),反映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有旺盛的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在世界各国经济亟需恢复增长的背景下,外部需求将更加强烈。另一方面,拥有14亿人口的我国市场是全球最大市场,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提升,消费规模持续增

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虽然我国制造业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是我国高端消费市场无法得到满足,消费品生产技术创新不足,附加价值不高,对适应城乡居民需求变化的新产品开发不力。通过对外投资合作可以收购和控制全球高端原材料、半成品或知名品牌产品,强化我国对高端资源的掌控力,满足内需市场升级需求。

#### (二) 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际金融论坛 2021 年春季会议发布的《2021 中国报告》“‘一带一路’国家央行年度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我国没有因疫情减少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支持,“一带一路”项目也没有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受到影响。80% 的受访央行预测,“一带一路”建设将在未来 5 年内促进其辖区内 GDP 增长。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后疫情时代,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将更加突出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为重点,以海外各种园区合作平台为载体,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同时,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将取得积极进展,理念引领持续增强,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此外,“一带一路”项目将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这些项目可以为所在国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 (三) 对外投资合作转向区域化周边化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通过强化与周边经济体投资合作,构建与周边区域的小循环有利于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有利于深化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周边经济体在国际上的地位。东盟、东亚、南亚等周边国家与我国地理相邻,同时由于周边国家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产业链互补性,具有很好的小循环基础。不难看出,后疫情时代,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将更加注重与东

盟、东亚、南亚等周边地区国家的互利共赢。

#### (四) 对外投资合作收益受到严峻挑战

从风险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在全球蔓延,并在部分区域二次暴发,对于经济和财政的冲击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部分国家还面临货币贬值等问题,宏观环境对我国投资收益形成严峻挑战。从重点投资区域来看,东盟各国、南亚和南美洲均面临经济和财政困局,我国在这些区域的投资合作项目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随着各国纷纷加速疫情经济复苏,境外投资领域竞争更加激烈,以电力工程建设领域投资为例,随着全球电力巨头的发展和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加速,电力投资领域竞争激烈,可能影响项目的回报。此外,部分新兴经济体囿于政府治理能力的局限,可能导致计划外成本侵蚀我国境外项目收益。

#### (五) 对外投资合作趋于注重质量效益

在新冠肺炎疫情加剧逆全球化以及地缘政治争端多发等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将更加理性审慎。一方面,对外投资将更多流入政治风险相对较低的友好国家,对高风险国家投资将更多采用“多方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方式展开。另一方面,企业会强化投资与经营活动中的合规管理,以适应东道国法律与政策要求。同时,企业将更加重视对外投资效益,市场机制将在投资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企业成为真正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

#### (六) 对外投资绿色合作加速推进

随着世界各国碳中和战略相继出台和我国承诺实现碳中和时间节点,加快推动对外投资绿色合作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成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举措。未来,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更加紧密,绿色产业、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绿色交通等重点领域的国际合作将持续深化。如以燃煤电

站为代表的境外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将加快向更低碳和清洁的清洁能源项目转型发展。此外,“走出去”企业的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境外项目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更加健全。

#### 四、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发展策略

(一) 推动国内国际互动,强化与国内循环融合发展

后疫情时代,一方面,要通过对外投资合作强化特殊时期国际物资调配和国际产能合作能力,建立健全紧急情况下跨国物资快速通关机制和运输通道。同时,在对外投资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布局规划中要做好风险预警,防范再次受到疫情冲击,保障疫情冲击下物资正常流通,确保全球各地生产基地间产能调配。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诉求,通过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带动我国优势和富余产能走出去,提升国内资源要素效能,促进我国产能优势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畅通外部要素回流,改善国内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配置,探索对外投资合作服务国内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产业根基。

(二) 顺应全球形势变化,优化调整对外投资结构

一是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提升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在对外投资产业中的比重。更加重视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布局,注重布局国际先进技术、销售渠道、管理经验和知名品牌等价值链中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端要素。二是加快服务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将服务业投资作为培育竞争优势的领域,加大对服务业上游企业投资并购力度,推动“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对外投资布局。三是支持中资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中资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走出去”对外承包工程,开展咨询、勘察、设计、施工、安装、运营、管理等多项活动。支持对外承包工程企

业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创新,形成专利技术优势,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承包高技术含量工程的能力。加快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信息化业务平台建设,在高技术含量工程承包中积累经验,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三)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完善对外投资区域布局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仍将是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主要载体和重点方向。一是在“一带一路”总体框架下,将东盟作为建设对外投资合作新格局的突破口和示范区。充分发挥我国在数字技术、电子信息等先进领域的优势,以数据信息为纽带,以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发展为契机,积极探索与东盟主要国家产能合作新模式,带动数字化跨境制造网络的形成,实现我国与东盟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二是把握疫情下部分地区对我国倚重上升势头,推动对重点区域对外投资合作。南亚是我国经略周边的重点地区和外防输入的重要前沿,近期,随着印度疫情强势反弹,并向周边国家外溢蔓延,南亚地区疫情恶化,严重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建议充分发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推进器”作用,加大战略塑造力度和建设性投入。三是坚定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深化中俄“背靠背”战略合作,持续巩固发展中国家基本盘,运筹好中东、非洲、拉美等重要方向。因国施策,加强与有关国家在经贸、科技和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

(四) 防范境外债务风险,创新对外投资融资方式

密切关注各国疫情发展态势,防范他国主权债务风险外溢,要警惕欧洲可能再次爆发主权债务危机,防范美国不断攀升的政府债务风险,关注新兴市场国家高居不下的外债风险。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下部分行业和企业受到严重冲击,企业融资诉求更加强烈的实际情况,除了优化传统融资模式,还要加快创新对外投

资合作融资新模式。一是建议金融机构结合行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例如,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建设特点是周期短(一般建设周期约4—10个月),目前项目融资关闭速度与特险审批要求难以匹配,导致部分项目投保难。对此,建议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例如,调整特险审批口径以支持我国企业投资境外新能源项目。二是创新发展绿色金融市场。结合全球碳中和新征程发展,不断挖掘绿色金融发展潜力。通过丰富绿色金融工具箱、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下开设“碳排放”通道、推动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等举措,支持企业“绿色”走出去。三是探索“集群式”融资模式。中小企业防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后疫情时代对融资诉求更加强烈。建议创新实施大卖场“集群式”投资、生产加工型“集群式”投资。依托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探索成立中小企业海外发展基金。探索设立私人“集群式”公共投资平台等。

(五)加力提供公共产品,争取更多国际理解和认同

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主动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义务,在抗议合作气候变化全球减贫等方面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不断增强制度性权利,实现义务和权利的平衡,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突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积极开展国际疫苗合作,帮助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和重振经济。

(摘自《中国国情国力》2021年第10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田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所。

(上接第8页)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历史决议均形成于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节点,诞生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氛围之中,对推进和引领党的事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同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通篇融汇了百年来党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所进行的奋斗、牺牲和创造,从历史、现实、未来相贯通上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

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对引导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将同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为党的重要历史文献载入光辉史册。

(摘自《人民论坛》2021年12月15日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王一彪,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意蕴和思想智慧

顾海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他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为基本前提，以“五大文明”进步为主体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发展为基本过程和目标，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根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形态根本特征的概括

对社会发展形态特征和本质的正确认识，是以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理解为基础的，特别是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为根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为根据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把握和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与之前党的八大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较，可以看到：八大提出“人

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社会主要矛盾之后，经过 20 年的艰辛探索，在总体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提升了国家经济实力，逐步满足了人民基本需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之后，经过 30 年的艰苦奋斗，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物质文化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面临发展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朝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向奋进的新时代。通过解决这三次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不断探索，同步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对待和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形态上呈现新的特征。

第一，“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拓展，涵盖了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八个主要方面。“需要”，在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形态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首位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对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形态演进因素的概述中，是以“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



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为序列过程和传导系统的,“需要”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和牵引性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晚年把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需要”的内涵,概括为“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美好生活”涵盖了恩格斯提出的“需要”的全部内涵。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显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刻画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二,相对于“需要”而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体现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发展的“供给”能力和状况。“五大建设”是满足“美好生活”八个方面“需要”的“供给”系统,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充分的和全面的发展,是提升“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根本基础和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辩证发展,是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和根本特征。

第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提升“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水平和程度,就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全局上就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编制“十四五”规划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

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向,它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规划和部署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牢牢地连接在一起,也是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的必然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科学概括,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致力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第一大历史任务后,新中国一经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旗帜,矢志不移地为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而奋斗。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深切感悟到:“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思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历史任务的决心。在1975年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

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奋斗目标。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说法”,认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是邓小平同时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基础;“小康社会”以及之后实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程中,在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继续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历程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新的内涵,成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底色和时代精神。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为圭臬,在目标内涵上,形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在总体发展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课题;在战略规划中,升华了社会全面文明发展形态的新境界。回溯历史、立足现实和瞻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的、协调的发展,升华为“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思想。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更加卓著的发展目标和更加鲜亮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的新概括中提出:“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方面的概括,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征的概括,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规定的集中体现,在内涵和特征上,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在对以往社会文明形态特征概括时指出:“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新时代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新发展阶段“量变”向“部分质变”转变的过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制度完善特征的全方面概括**

人类文明形态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接续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不发达阶段和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发达”也一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态势。1959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时也认为,这种“不发达”的阶段性特征,绝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社会发展阶段“质变或部分质变”的过程,一方面是“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

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另一方面是“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在总体上还是处在“不发达”的状态中。1987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992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站在“初级阶段”的现实基础上，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作出瞻望，体现了邓小平对“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及其变化发展的必然性的观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成为新时期立论的基础和发展的立足点；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不懈奋斗，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成果，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这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奋力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篇章。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今后30年我

们将处在新发展阶段的判断。新发展阶段，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恩格斯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新发展阶段作为“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面临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用三个五年规划期的时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三个五年规划期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的特征，成为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规定的立场，成为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路向的基本标识。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相连接，体现了它所具有的广泛的世界意义及其蕴含的共同价值观和普遍性特征**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只是基于中国社会形态的特殊性的概括，也是对人类社会形态的一般性特征的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只是专属于中国的范畴，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形态探索的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

泰山而小天下’。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的共同价值观的普遍性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范围内文明形态理解的拓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是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赓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在最广泛意义上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征,是从“人类文明新形态”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特征作出的科学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和普遍意义在世界文明形态发展中的集中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在于:“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与之相对应的主要内涵在于“五个坚持”,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其主旨,集中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基本内涵和具体要求。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向世界的根本要求和基本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连接,顺应了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等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能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指向和发展方略。

“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它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文明形态的理论,深刻地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成就和成果。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奋斗中,特别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凝结的理论结晶和思想智慧,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9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顾海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 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 科学认知的突破与发展方式的改变

王心源 郭华东 骆磊 常睿春

从瑗瑛(今用“爱辉”)到腾冲的人口密度突变分界线即“胡焕庸线”(以下简称“胡线”)是我国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典型现象的分界线,而构建“美丽中国中脊带”(以下简称“中脊带”)则是缩小“胡线”两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战略抓手。研究与认知从“胡线”到“中脊带”的内涵变化,以及未来科学战略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战略意义。

## 一、“胡焕庸线”与“美丽中国中脊带”提出的时代背景

### (一)“胡焕庸线”提出的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全面抗战前夜,东北已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人口开始流入关内;随后的全面抗战时期,大半个中国都是战火纷飞的状态,更产生了大规模的中国人口向西迁移现象。在决定长期抗战国策之后,开发西北和建设西北的旗帜又被高高举起来并成为当时热门话题之一。1935年,中国人口4.5亿,中国人口是否过剩?还有没有适合移民之所?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移民问题不仅是政府也是科学界需要回答的问题。胡焕庸在《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一文写道:“年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者,日见其多,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其实当今亟须解答之问题,各方面对此之意见,甚为分歧。”针对这个亟须回答的问题,胡焕庸在统计

资料不全且难以收集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终于铸就该不朽的名作。“今试自黑龙江之瑗瑛,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人口比例“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这条“瑗瑛—腾冲线”被后人称为“胡焕庸线”。

### (二)“美丽中国中脊带”提出的时代背景

2013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到北京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进行座谈。李克强在座谈会上提出了“胡焕庸线”“该不该破?能不能破?如何破?”3个问题。中国科学院学部遂于2015年设立学部咨询评议项目“‘胡焕庸线’时空认知:聚焦‘总理三问’”对此进行专门研究。

对于“总理三问”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与讨论。基于前期的系统分析研究,郭华东等对在新时期、新发展条件下,“胡焕庸线”应该破及其依据、“胡焕庸线”可以破及其理由、破解“胡焕庸线”的思路给出初步认识与建议。

在2017年12月,“‘胡焕庸线’时空认知:聚焦‘总理三问’”项目组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讨论如何破解“胡焕庸线”时,学者们对于近80年来中国人口突变线的位移而形成的包络带——这在呈金鸡状的中国版图上此区处于“中脊”的位置故称“中脊带”——进行热烈讨论。郭华东结合党中央对于美丽中国建设要求,在会议上提出把“美丽中国中脊带”作为破解“胡焕庸线”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战略抓手之建议。

## 二、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是科学认知的改变

(一)“胡焕庸线”是近代的人口密度突变分界线,刻画了线东、西两侧人口密度的差异

胡焕庸根据当时的县(区)为统计口径的人口数据,分别做了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事实上,胡焕庸并没有在其文章的附图中直接画出“瑗瑗—腾冲”这根直线。这是由于该图是按照行政县域进行的人口统计,即在一个县域内人口被看作是均匀分布的。所以,如果从瑗瑗—腾冲直接拉一条直线,那么就会破坏一些县域的完整性,从而打破按照县域人口分布均匀的假设前提。

人口数量、质量与密度是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与环境的综合反映。中国人口格局形成是作为农业大国的人口在社会—经济—科技—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长期演化的结果。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在黄河冲积平原和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河北平原。葛剑雄提出那时人口疏密分界线应该是燕山—太行山—中条山—淮河。此后经历了“永嘉丧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等几次大规模自北向南的人口迁徙活动,以及明清及民国时期“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等几次大规模移民,使得中国人口分布的格局在不断调整。1935年,胡焕庸提出以“瑗瑗—腾冲线”将我国人口分布分为东南和西北人口疏密悬殊的两部分,这反

映的就是近代中国人口密度分布格局的状况。

我们对《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一文中给出的数据进行较精确的计算表明:1935年,若扣除现在属于蒙古国的地区人口,则“胡线”西部人口占总数的3.21%,东南人口占96.79%。到第六次人口大普查的2010年,“胡线”西部人口占全国比例增加到6.35%。75年间,西部人口比例增加了3.14%,比1935年约翻了一番;而“胡线”西部人口的绝对数量更是1935年的约4倍。“胡线”两边无论相对数量或是绝对数量绝不是什么“岿然不动”。近代—当代的人口密度变化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变化的转折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的分界也暗示中国脱离传统农业发展模式而伴随全球化征程开始走向了新的发展模式。

“胡线”是中国近代的人口密度分布的突变线。至于这条线与一些自然要素甚至人文要素的应合,那是因为这条线位于农牧交错带背景下。我们既不能把“胡线”与降水线、生态线、文化转换线等分界线等同,也不必用“胡线”去综合它们。“胡线”本身就是反映中国人口分布的疏密情况,是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线。“少量关于胡焕庸线的引申研究和应用属于穿凿附会的形式命题,是对胡焕庸线概念的一种不恰当的‘学术消费’,是不值得提倡的。”

(二)“美丽中国中脊带”因规划未来新发展空间而提出,其地理学背景是农牧交错带

农牧交错带是自然与人类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空间。中国东北—西南走向的农牧交错带,是纬度地带性与经度地带性再加上山地垂直地带性下的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综合反映。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国农牧交错带又形成东北段与西南段的不同。东北段的农牧交错带是纬度地带性与经度地带性的叠加。北方农牧交错带生产特点的形成也许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4300年前龙山时代

的前期。而西南段,由于青藏高原东缘及中高山地的影响,呈现出山地农牧交错带的特性,即在纬度地带性与经度地带性上再叠合山地垂直地带性的作用,形成诸多民族分布其中。

“中脊带”是基于“胡线”东南、西北两侧传统的半农半牧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并考虑未来国家战略新发展需要而建议划定的自东北到西南的地域空间。在呈金鸡形状的中国版图上,此区处于“中脊”的位置。在划定边界时,考虑到县(区)级行政区域的完整性并进行适当调整。“中脊带”核心区涉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云南9省份,旁及辽宁、河北、青海、重庆等省份。此区是我国相对贫困区集聚带,是生态战略防护带,也是国家战略空间安全带。

### 三、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是发展方式的转变

80多年前,胡焕庸是立足于传统的农业且当时4.5亿人口与可耕地尖锐矛盾情况下,讨论人口分布与农业区域开发问题:“今试就国境以内,加以检讨,其犹有地形平坦,土壤肥沃,雨量相当充分,而人口亦比较稀少者,殆惟满洲北部嫩江流域一带之地,……是为国内惟一可供移民之区”。然而,当前我们所说的西部开发,决非传统农业的种植业开发问题,而是新时代适合西部的新业态与新发展的问題。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持续密集型生产发展模式特征

中国历史发展模式是指曾经真实存在于过去中国的发展模式。一言以概之,是在以农业为主流产业的历史演进过程形成的发展模式。形成的朝代更迭、不断复生的封建社会管理与经营过程一直延续2000余年。

Samir提出地中海/欧洲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欧洲中心的历史资本主义不断将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大量驱赶出去,这种历史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后来征服了美洲才得以疏解外流人

口的问题。而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完全不同,它是确立而非泯除农民争取土地的权利,并从而强化农业生产,同时将工业制造分散到乡村地域。这使得中国在当时许多的物质生产领域都大幅超越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的成功,才造就了现代欧洲超越中国。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组织模式的稳定,建构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模型——筑基于农业持续的密集生产,于是形成“胡线”东侧的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特点。在中国东部,如黄淮海平原区,从农业发展、商品交换、市场形成及其演变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基本符合克里斯·泰勒的理想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形成的要素与条件,在长三角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同样具备这样的特征。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逐渐形成的城镇及其体系空间结构,是在农村市场服务为中心基础上演化发展起来的一种模式。

(二)“美丽中国中脊带”新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考

相比于东、西部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中脊带”的承载力可谓介于其间。“中脊带”是为了缩减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获得区域发展更充分而提出的战略对策。“中脊带”是要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国防建设等多方面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其未来空间战略发展规划至少考虑6个方面。

(1)把“中脊带”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示范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通过吸收当代新科技革命成果,实现国家生态化、数字化、智能化、高速化、新旧动能转换与经济结构对称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是

以新发展为理念,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作为具备一定生态承载力的“中脊带”,是率先进行新基建的理想国土空间区域。

(2)把“中脊带”作为构建国土空间战略发展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角度,可将我国划分为3个一级国土空间区域,把“中脊带”作为构建国土新的战略空间

格局的一级区域来规划发展,并根据“美丽中国中脊带”自然与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不同,可以分为“三段”(“四区”)(图1):东北段(I)——黑龙江、兴安生态旅游经济带区;中段1(II-1)——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张家口—大同一锡林郭勒生态经济文化带区;中段2(II-2)——西安—兰州—银川—太原生态经济文化带区;西南段(III):重庆—成都—昆明—瑞丽生态经济带文化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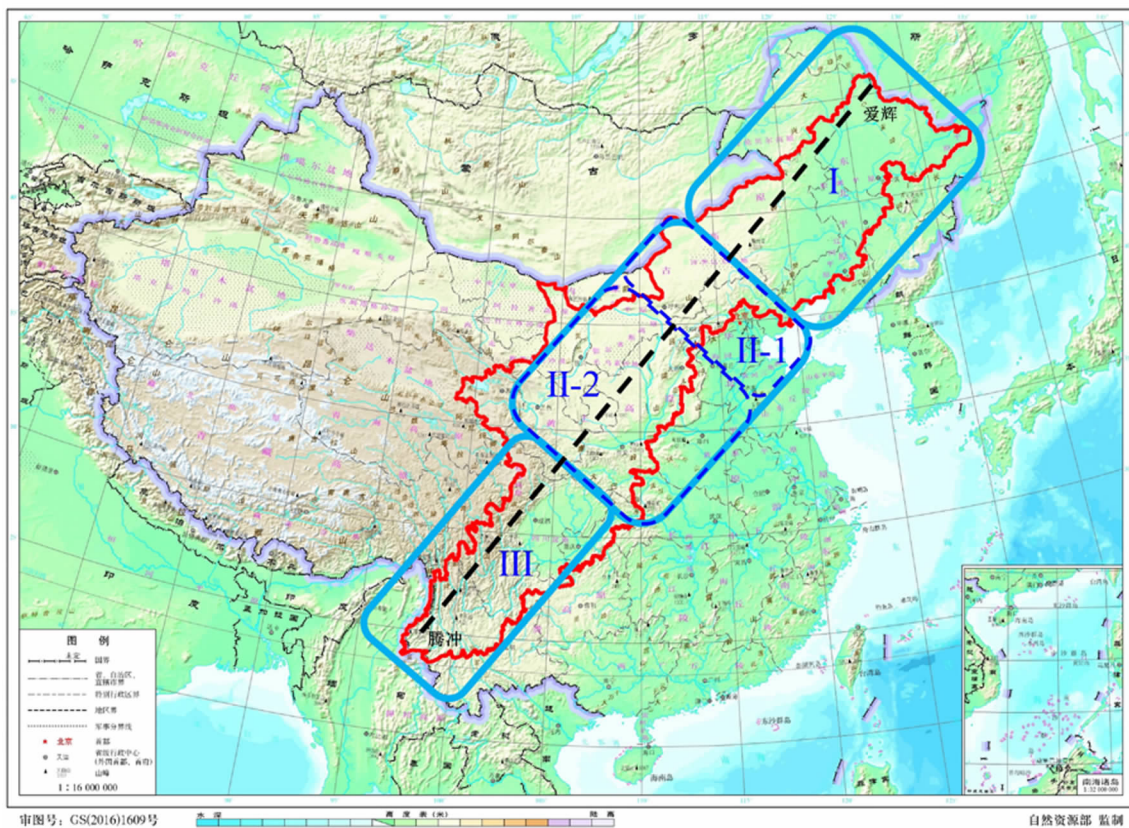


图1 “美丽中国中脊带”位置与分段图

黑色虚线指示“胡线”,红色多边形指示“中脊带”边界

(3)把“中脊带”打造成为内外循环发展的枢纽通道。“中脊带”位于中国版图重要的、特殊的位置与区域,处于中国东北—西南贯通的枢纽位置。“中脊带”作为东西联动的传递带、新旧动能的转换带、新基建的示范区,是“双循环”的枢纽,更是内需新经济的重要启动区。打造此枢纽可以首先以“成渝双城经济圈”“西安城市经济圈”“昆明经济圈”并与中—缅通道连接为启动段,构建拉动中国西

南区域发展动力区,打造西部合作的改革开放发展平台,再向北部延伸,逐步构建区域联动一体化发展。

(4)把“中脊带”建设成为生态安全屏障带、国防安全保障带与新的宜居生活区。1.“中脊带”跨越不同的自然与人文地带,自然生态环境丰富多样,民族与人文资源丰富多彩。有利于打造新型城乡宜居生产—生活—康养带。把“两屏两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进行整合,构造“中脊带”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安全屏障带;把“中脊带”的“四区”打造成四季旅游与康养的宜居生活带,构建自然—文化—服务高质量旅游带,打造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消费区。2. 面对全球变化、海平面上升,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中脊带”南北联通向的巨大空间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安全带成为必要。“中脊带”东侧边界距离海岸线从100—1000km不等,因此能有效避防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灾害与风险。“中脊带”穿越众多山川,具有重大的国防空间价值——其可以在空间上对“老三线”进行延展,打造成为中国“新三线”防御地带。

(5)“中脊带”要创造并形成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由于现代快速、方便的交通、信息与物流,打破过去联通的限制,打破以农村市场服务为中心的“中心地”理论成为可能。一个城市不再是仅仅与其周边地区紧密关联,而是在功能、信息、物流、文化等领域跨

地域空间进行联系。“中脊带”的新型城镇化要强调适宜性、差异化、个性化的特色与高质量发展,宜居、众多小城镇既在空间分离又在物流、资金、信息、人员上联系的“群”与“带”。

(6)把“中脊带”发展战略与国家其他战略相对接助力复兴梦想实现。“中脊带”发展模式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要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要求,要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在“中脊带”要进行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人口—文化全域发展整体未来规划设计,把新型城镇化、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起来,把北部的中蒙俄经济走廊、西南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发展贯穿起来,实现人—地协调平衡的共同新发展。

(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年第9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王心源,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上接第16页)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带领人民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百年征程,“雄关漫道真如铁”,依靠伟大精神力量的激励,我们党赢得了长征的胜利,中国革命开创了新局面,对于建立新中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创举,是新的伟大长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方向、道路和目标,也对我们党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党的奋斗精神是一个新的激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鼓起了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挺起了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夺取新的长征伟大胜利的精神脊梁。

(摘自《中国共产党》2021年第11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颜晓峰,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管理的实践及启示

邹晓梅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不动产价格暴跌,企业和居民财富大幅下降,企业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借贷下降、投资减少,居民收入下滑、消费降低,经济体需求显著萎缩。为了弥补企业和居民需求萎缩造成的产出缺口,日本政府走上了长期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之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弥补私人部门需求萎缩造成的产出缺口,使得经济泡沫破灭后GDP仍然能够维持在泡沫经济时期的最高点上。由于政府收入降低,支出增加,赤字明显攀升,债务融资规模显著增加。日本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不到50%的水平攀升至当前的200%,其中,既包括中央政府债务,也包括地方政府债务。日本属于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经过长时间探索与发展,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融资的管理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我国与日本金融体系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日本地方政府融资体系对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 一、日本地方政府支出与收入结构

日本地方政府包括两个层级:47个一级行政区,即通常所称的“都道府县”;1700多个二级行政区,即市町村。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全国性事务,地方政府主要负责管理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治安、消防以及道路、水务等基础设施。2018年财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比重为42.5:57.5。越是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支

出,地方政府所占比重越高(见表1、表2)。

表1 2018年财年日本中央和中央财政支出构成

	占总支出的比重	地方占比	中央占比
		57.5%	42.5%
卫生	3.7%	99%	1%
学校教育	8.8%	87%	13%
司法、警务、消防	4%	78%	22%
社会教育费等	2.9%	78%	22%
民生费用	21.9%	70%	30%
国土开发	8.3%	74%	26%
国土保护	1.5%	62%	28%
工商支出	4.5%	62%	28%
灾后重建等	0.8%	78%	22%
公债费用	20.6%	35%	65%
农林水产业支出	1.7%	45%	55%
住房支出	1.9%	32%	68%
恩给费	0.1%	3%	97%
养老金	6.9%	0%	100%
防卫费	3.2%	0%	100%
一般行政支出	7.8%	78%	22%
其它支出	1.2%	0% 100%	

表2 2018年日本地方政府主要支出构成

	地方政	府都道府	县市町村
公共福利支出	26.2%	15.9%	36.3%
教育支出	17.2%	20.4%	12.1%
债务支出	12.6%	13.9%	9.6%
土木工程支出	12.1%	11.3%	11.2%
一般行政支出	9.5%	5.7%	12.2%
卫生支出	6.4%	3.2%	8.3%
商业和产业支出	4.9%	6.3%	8.3%

农林水产业支出	3.3%	4.8%	2.3%
其它	7.8%	18.5%	5.0%
合计	100%	100%	100%

2018年财年,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占比为61.2:38.8。其中,都道府县占比17.5%,市町村占比21.4%。占都道府县税收收入前3位的是都道府县住民税、地方消费税和事业税,占比依次为31.1%、26.3%和24.3%;其次是车辆税、轻油交货税、不动产收购税,占比依次为8.5%、5.2%和2.2%。市町村税收来源较都道府县更集中,市町村住民税、固定资产税、城市计划税和市町村烟草税占比依次为47%、40.5%、5.8%和3.8%,住民税和固定资产税占市町村全部税收来源的比重接近90%。

日本地方政府收支缺口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债务融资解决。地方政府收入来源主要包括3个渠道,即地方税费收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债务融资。日本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比重大约在35%左右,主要是地方交付税和国库支出金。另外,还有少量的地方让与税和地方特例交付金。2013—2017财年,债务融资占日本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比重大约在10%~12%之间。

## 二、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结构及模式

### (一) 债务融资结构

《地方自治法》第230条款授权日本地方政府发行债务进行融资的权利。在日本,一年期以上的地方政府债务统称为地方债,既包括公募债券和私募债券,也包括金融机构贷款。

《地方财政法》第5条规定,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筹集的资金应主要用于交通、水务、医疗、卫生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及维护,也可用于与重大灾后重建有关的临时性大规模支出,还可以用于经常性支出,用途比较多元。

与美国地方政府融资主要依靠发行市政债券不同,日本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更多元化,包括发行债券和申请贷款,包括公共资金

也包括私人部门资金。

总体而言,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主要包括4个方面:中央政府提供的融资、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JFM)提供的融资、公开发行业债券,以及其他私人部门提供的融资。前两部分称作公共资金,后两部分称作私人部门资金。

2003年以来,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大致维持在200万亿日元左右,占GDP的比重大约在35%~40%之间。日本地方政府债的主要投资者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一般政府和私人养老金。

### (二) 债务融资模式

1. 中央政府提供的融资以FILP贷款为主。中央政府提供的融资主要是通过日本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FILP)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FILP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在国债市场进行融资,向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固定利率、低息贷款A,主要用于灾后重建、偏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发展,以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该类债务支持地方政府5年以上的投资计划,且必须经过国会批准,是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所有手段中最安全稳定的。FILP贷款一度占到地方政府融资资金来源的60%以上。2001年改革之前,FILP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邮政储蓄和养老金储备存款,属于被动负债,资金使用效率较低。2001年,日本政府对FILP进行改革,大量压缩FILP预算,并根据资金需求在国债市场发行债券进行融资。随后FILP贷款在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中的占比显著下降,2018财年中的占比为24.1%。

2. JFM贷款——特殊的地方政府银行贷款。JFM是日本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的简称,成立于2008年,是由日本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成立的类政策性银行机构。JFM主要在资本市场公开发行业债券进行融资,专门向地方政府的污水处理、交通、医院、供水、公共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也为

地方政府一般收入缺口提供临时财政对策融资 B。地方政府和市政企业都可以向 JFM 申请贷款,但必须获得总务省或所在一级行政区长官的同意。自成立以来,JFM 从未出现过贷款违约。JFM 是全球唯一一个由一国所有地方政府都参与出资的公共团体 C,出资比例由地方政府在 JFM 的贷款余额以及财政能力决定。截至 2019 年 3 月,日本 1789 个地方政府共对 JFM 出资 1.2 亿美元。其中,都道府县出资占比 38.4%,市(不含政令市)和东京特别区出资占比 38.4%,政令市 D 出资占比 17.3%,町村和地方政府协会出资占比 6.3%。截至 2019 年 3 月底,JFM 共有资产总额 2217 亿美元,负债 2190 亿美元,净资产 26.6 亿美元。

2012 财年以来,JFM 贷款占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来源的比重保持在 15%~16% 之间。为了匹配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周期长的特点,JFM 贷款期限一般较长,分为 15 年、20 年、25 年、30 年、40 年不等。截至 2019 年 3 月,JFM 持有贷款余额 23.5 万亿日元(约 2119 亿美元)。

从用途看,污水处理项目贷款占比 31.6%,临时财政对策融资占比 23.9%,供水项目融资占比 13.9%,医院项目融资占比 4.5%,交通运输融资占比 3.6%,其余贷款占比 22.5%。

从借款者结构看,都道府县贷款占比 20.9%,政令市贷款占比 15.4%,市町村(含东京特别区)贷款占比 61%,地方政府企业和协会贷款占比 2.8%。

JFM 的宗旨是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因而在贷款利率制定方面,JFM 坚持依据融资成本制定贷款利率 E。为进一步减轻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JFM 还用地方政府举办的各类赛事获得的部分收益成立了贷款利率削减基金。截至 2019 年 3 月,该基金规模达 0.9 万亿日元(83 亿美元)。

JFM 主要通过是在资本市场发行没有政府担保的债券筹集资金,也发行少量担保债券和长期银行贷款。非担保债券又包括国内公开发行的债券、国内非公开发行债券和海外发行的债券。2018 财年,JFM 发行了 149 亿美元非担保债券,其中,国内公开发行债券 73 亿美元、国内非公开发行债券 44 亿美元、海外发行债券 32 亿美元,担保债券 23 亿美元和长期银行贷款 4 亿美元。截至 2019 年 3 月,JFM 债券余额为 20.3 万亿日元(1838 亿美元),长期银行贷款余额 0.1 万亿日元(12 亿美元)。地方政府对 JFM 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JFM 持有 250 亿美元左右的利率波动储备金以应对由于资产负债久期缺口而造成的利率风险。因此,JFM 的信用评级在日本公共机构中是最高的,与日本中央政府相同。

3. 直接在资本市场公开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目前,在资本市场公开发行债券是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来源中占比最大的项目。2013—2018 年,公开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占比大致维持在 32%~33%,年发行规模在 6000 亿~7000 亿美元之间。与美国市政债类似,投资者购买并持有日本地方政府债券获得的利息免缴个人所得税。同时,日本所有公开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本息偿付都受中央政府的担保。日本地方政府债券的投资者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一般政府,其次是私人养老基金、非金融企业、海外投资者和居民。截至 2019 年 3 月,上述投资者持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占比依次为 53.2%、23.4%、14.9%、2.6%、1.1%、1.1% 和 0.5%。

日本各地方政府可以单独发行债券,也可以跟其他地方政府一起联合发行债券,即联合地方政府债券。联合地方政府债券有利于增加单只债券的规模、信用等级,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影响力。联合地方政府债券是日本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基准债券,每月定期发行一次,每次发行规模约为

1000 亿日元,除利息外的发行条件均相同。目前,能够参与联合债券发行的地方政府仅有 36 个规模较大的地方政府,包括 24 个都道府县和 12 个政令市。联合发行主体负责偿还各自的债务,对整体联合地方政府债券的偿付具有连带责任。36 个联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主体共同成立了“流动性特殊沉没资金”担保债券本息支付,以应对突发紧急情况,规模相当于当年偿付额的十分之一。截至 2017 年末,日本联合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将近 14.1 万亿日元(约 1270 亿美元),2012—2017 年,联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约占日本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的 20%~25%。

除全国性公开发行的地方债,日本地方政府从 2002 年开始还发行少量的居民参与型公募地方债,以吸引地方政府所在的当地居民或者其他特定公民购买,主要用于修建或完善当地的公共设施,如医院、学校、图书馆、公园、公路等。居民参与型公募地方债在促进日本地方债发行方式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参与意识。

4. 其他私人金融机构及部门提供的融资。除中央政府贷款、JFM 贷款和公开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外,日本地方政府还可以自身名义向商业银行、信托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多种形式的借款。目前,该类方式筹集资金来源占比大约在 27%~28% 之间。

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伴随日本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FILP)改革、日本邮政私有化改革、融资政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实施,私人部门提供的资金在地方政府融资来源中的占比逐渐增加。

### 三、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体系

从历史看,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从未出现过违约。这得益于中央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日本主要依据《地方政府财政健全化法》对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状况进行监管。总体观察,中央政府主要从 3 个方面

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一) 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债务提供担保

日本内务省每个财政年度都会制定地方政府财政计划,明确当年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额度,并据此制定地方政府借贷计划,对本财年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进行管理,地方政府借贷计划与中央政府预算制定密切相关。

日本都道府县在发行债务前必须咨询或告知内务省,市町村发行债务前需咨询或告知其所在都道府县长官 F。地方政府必须获得同意才能申请公共资金融资,财政状况恶化的地方政府,即实际债务偿付比率超过 18% 或者出现财政赤字的地方政府,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发行债务。

中央政府对其批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务的本息偿还提供担保,并将债务本息支纳入地方分配税(LAT)体系。地方政府在没获得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融资,相关本息支付不纳入地方分配税安排,不能获得中央政府担保。

#### (二) 地方分配税体系确保日本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

地方分配税是日本中央政府为了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出台的中央税收转移支付安排。各地方政府获得的地方分配税额度等于该地本财年标准财政需求与标准财政收入之间的差额。标准财政需求里包含本财年地方政府债务本息支出。地方分配税是地方政府重要资金来源,占比接近 20%,在确保地方政府维持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市政团体规模越小,其对地方分配税的依赖就越大。据公开信息披露,2017 财年地方分配税收入占日本中等城市、小城市、大町村(1 万人以上)和小町村(1 万人以下)总收入的比重依次为 11.1%、23.4%、25.1% 和 36.6%。中央政府将 5 项中央税种按照法律规定的比例计提加总计算得出历年地方分配税规模。为了弥补资金缺口,2001 年起,日本政府创设

临时财政对策融资制度,将原本应作为地方分配税支付给地方政府的部分资金,改为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务的方式获得资金补偿。地方债务体系与中央税收转移支付体系相结合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和引导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 (三) 完备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积极的风险预警体系

日本政府建立了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相关的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地方政府必须按时披露财政收支状况、实际赤字率、合并实际赤字率、实际债务偿付率及未来债务负担等信息。同时,所披露的信息还要接受第三方审计。公营企业也要定期披露信息并接受审计,以免出现隐性负债。

地方政府必须充分披露包括或有债务在内的财政信息。如果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超过警戒线,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实施财政巩固计划。如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则必须采取措施实施财政重建计划(见表3)。实施财政重建计划的地方政府除了为灾后重建融资,不得发行债务进行融资。地方公共企业也必须保持财务稳健。

表3 地方政府债务预警指标

	财政巩固警戒线	财政重建警戒线
实际赤字率	都道府县: 3.75% 市町村: 11.25% ~ 15%	都道府县: 5% 市町村: 20%
合并实际赤字率*	都道府县: 8.75% 市町村: 16.35% ~ 20%	都道府县: 15% 市町村: 30%
实际债务偿付率	25%	35%
未来债务负担比率	都道府县、政令市: 400% 市町村: 350%	
资金缺口比(公营企业)	20%	

资料来源:日本内务省。

注: \*合并实际赤字率包含了地方一般预算账户和公营企业账户。

## 四、启示与借鉴

### (一) 探索多元化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

日本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并不囿于在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融资,形式非常多元。除了发行公募债券外,地方政府还可以获得中央政府转贷资金,可以向政策性金融机构(JFM)和私人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多元化的融资方式有利于满足不同类型地方政府不同种类的

融资需求。例如,在资本市场发行公募债券融资的门槛其实很高,仅适用于少数规模较大的地方政府。事实上,2018年财年,全日本仅有55个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公开发行债券融资,其中,35个是都道府县,20个是规模较大的政令市。一些规模较小、财政较弱的地方政府更多只能依靠间接融资。

按照新《预算法》规定,我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部分计划单列市具有自主发行债券举借债务的权利,市县一级尚不能自主发行债券融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行一般债券或专项债券的方式举借债务。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合规的举债方式十分单一。我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单纯依靠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可能影响地方政府融资效率。实践中,我国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债券仍然由商业银行购买并持有。对此,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明确规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为地方政府融资;地方政府有义务对其融资来源进行披露。同时,推动银行业改革,提高商业银行独立运营的能力,提升监管水平和效率,避免一些地方性中小银行演变成当地政府的融资平台。

### (二) 充分利用政府信用降低政府投融资成本

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大量长期低成本资金的支持必不可少。从日本的实践看,中央政府主要通过3种方式降低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的融资成本。一是向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提供担保,二是以自身信用在国债市场融资并转贷给地方政府使用,三是批准地方出资设立JFM向地方政府发行长期低息贷款。

在新《预算法》实施前,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对外举债的权利。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在财政收支方面,逐渐形成地方政府财权小、事权大的格局,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支出资金来源紧张。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不

断发展,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资金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划拨土地、注入优质资产或国企股权等方式搭建融资平台,为地方公共投资支出进行市场化融资,诸如发行城投债、申请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四万亿元大规模刺激方案出台后,地方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方面,融资平台的融资享受着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另一方面,却要支付远高于政府债券的融资成本,市县一级融资平台的融资成本在一些时期甚至超过10%,地方政府的信用并没有被很好利用。融资成本过高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国务院2014年43号文,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发行债券举借债务,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这当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每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与当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需外部融资规模相比差距依然较大。优质项目主要是以项目法人为主体开展市场化项目融资,一些公益类、准公益类项目通过融资平台进行融资的现象依然存在,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地方政府债券。二是从法律上讲我国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中央政府自然也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有担保和清偿责任。对于投资者而言,“让地方政府自负其责”基本是不可信的。由此可考虑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体系,由中央政府统一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同时,明确为合规的地方政府融资提供担保,切实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我国还可以借鉴日本JFM的经验,成立中国版的JMF,为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提供长期低息融资。

### (三) 建立完备的地方债务风险管理体系

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提供担保的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管理体系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主要包括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预警两大部分。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较为欠缺。首先,信息披露明显不足。各级地方政府的财务收支状况、债务负担情况、债券用途及相关项目进展等信息都披露不足。其次,我国尚无明确的地方政府债务预警指标及相对应的财政整顿方案。这就导致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加剧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甚至出现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激进的地方反而能大干快上,保守的地方反而落后了。

### (四) 注重对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培育

为了提高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影响力,日本创设了联合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提高单支债券的规模和信用,以提高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及影响力。截至2020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达25.5万亿元,已成为债券市场规模最大的品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券二级市场交易却很清淡,债券流动性不足问题突出。2020年全年,地方政府债券总交易额仅为13.5万亿元,同期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交易总额分别为46.5万亿元和88.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换手率仅为0.58,远低于政策性金融债(5.21)和国债(2.49),也低于中期票据(1.61)。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深度仍有待培育。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挑选几个经济发达、财政状况良好的省份在金融市场定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作为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基准债券,以提高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影响力,进而提高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

(摘自《宏观经济管理》2021年第10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邹晓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



## 新书推介

《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张法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B83/128-2

文化精神是一文化中一切时代、一切思想的总和。本书从文化精神的角度研究中西美学。作者从文化范式入手,在把握中西美学基本精神和对中西美学作宏观整体比较的前提下,切入到中西美学中“和谐”、“悲剧”、“崇高”、“荒诞与逍遥”、“文与形式”、“典型与意境”等基本概念,以及“创作理论”、“灵感理论”、“灵感的主体构成”和“审美具体方式”等具体问题,并结合了大量的中西艺术实践,作了观念的梳理与理论的分析概括,来寻找横跨不同范式之间的共同规律。

《权力及其伪装: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英)约翰·格莱德希尔著 商务印书馆 2021 D0-05/8

本书共分为九章,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的定位:今天的政治人类学、强制力的起源与局限:无国家社会的人类学、从等级到监视:农业文明的政治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殖民主义的政治人类学:对支配与抵抗的研究、后殖民的国家:历史的遗产与现代性的压力等。

《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英)迈克尔·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D033/37

本卷讨论了西方的“运气”及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分歧”,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与日本权力的自我摧毁,大萧条,美国与苏联权力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竞争,改良与民主资本主义的崛起。

《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周飞舟、谭明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D63/9

本书主要考察中央地方关系在当代中国的

变迁过程及其与城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联系。在大量经验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财政包干制和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是理解中央地方关系变迁的关键要素。

《战争、枪炮与选票》(英)保罗·科利尔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D74/13

本书中保罗科利尔关注权力,深入探讨为什么政治暴力在底层 10 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在世界经济底层的国家里,暴力一直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政治暴力本身是祸根,同时也是建立负责任的、合法的政府的障碍。他破除“选举迷信”,建议通过国际社会与最贫困社会的“共同治理”,使国际社会只需要较小的干预就能控制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内在的政治暴力。这股迄今为止如此强大的毁灭性力量才能被驾驭,从而转祸为福,把民主体制的破坏势力变成其捍卫力量。

《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挪)约翰·加尔通著 人民出版社 2013 D771.2/15

本书考察了当前美帝国衰退和没落的原因、过程、方式、时间和地点,分析了世界未来的世界格局,并对历史上西罗马帝国的兴衰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

《美国法律史》(美)劳伦斯·弗里德曼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D971.29/3

本书是弗里德曼教授于 1973 年出版的法律史巨著,多次增补、再版。内容涵盖美国殖民地时期、独立战争时期至 19 世纪中叶、19 世纪下半叶与 20 世纪四大部分,更论及刑法、民法、商事法、海事法、婚姻法等各个领域,并深入探讨美国司法文化的变迁。本书是美国学术界公认的最为完整深入研究美国法律史的著作。本



聚焦学科前沿 服务教学科研

JIAO XUE CAN KAO

教学参考

2022 年第 1 期(总第 693 期)

2022 年 2 月 25 日编印

主 办: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编 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

排版印刷:甘肃金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730071

电 话:(0931)7768718

邮 箱:gsdxtsgckzx@126.com

印 数:1~1000 册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 456 号